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55 期 2018 年第 2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方 薇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李金城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4



在福州

P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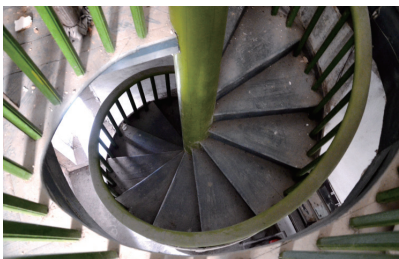


潮涌三江口

P38

寻找濂浦炽

——一个闽商的生前身后事



世味流年

4 荆 歌 在福州

在线读城

8 建 梅 你好，第六区

15 章 武 家住金山友是兰

22 丁 洋 潮涌三江口

名镇名村

29 孟丰敏 月上水乡林浦村

33 孙源智 国中称君子，乡里遗高风

38 林文政 寻找濂浦炽
——一个闽商的生前身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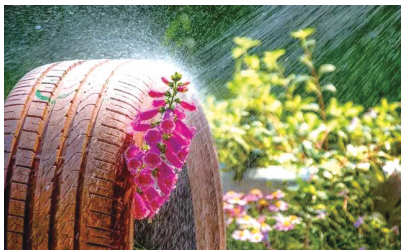
红色记忆

45 景 艳 永远的维廉同志

51 薛宗耀 潘汉年“出使”闽都

Contents

P56



流水中的花洲玉岛

P61



光景已自成追忆

P89

“观猎”与“官烈”



走笔仓山

- 56 治莹 流水中的花洲玉岛
- 61 黄河清 光景已自成追忆
- 68 陶真 梦松居和它的主人

榕垣旧事

- 72 陈敏华 花灯的记忆
- 77 沉洲 母亲的太平燕
- 81 林本椿 蒲天寿家族和福建的百年情缘

古文今读

- 86 卢美松 百年石刻《三百三十有三士记》

双塔视野

- 89 戴云飞 “观猎”与“官烈”
- 93 游友基 萨都刺诗咏闽都

- 封二 江爱松 金山碧水福之州
- 封三 翁志实 溪山观瀑图

在 福 州

荆 歌

我奇怪自己，活到了这样的年纪，竟是第一次来福州。其实我早就应该来的，福州于我，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的美丽的风土，它的丰富的文化，这里的小吃，这里的漆器，这里著名的漆艺漆画，还有我钟爱的寿山石，都是我的心海风光、梦里故乡。我甚至应该早就是一个福州人，说着文绉绉的好听的福州话，居住在闽江边上，白日窗外是纯净的蓝天，飘浮着同样清洁的白云，江上的白鹭，在眼前掠过，就像是报告着风的消息。风中还有海的气息，大海近在咫尺，它平静的时候平静，

澎湃的时候澎湃，一如我的心情，在时光和生命里潮涨潮落。茉莉花的香气，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被我闻到，而认真地去呼吸它，它却似有若无，琵琶半遮。它常常又在精致的茶具里，芳香和着清甜的泉水，令口舌生香、耳清目明，让肉身与灵魂都干干净净，透明得就像窗外蜿蜒闽江上澄澈的蓝天，世界和自己，就像一块水晶。

我可能和一些工匠成为君子之交，话虽不多，也从不在一起喝酒，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制作轻薄如纸的脱胎漆器。器物的形状，有





陈杰漆画作品



唐明修《断纹系列》

着简练的线条，却饱满秀气，美妙到没有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我看他们创作漆画，一层层地涂上天然大漆，一层层地磨去，就像神秘的魔术师，让奇幻的图画，在模糊中清晰，在平淡中出奇。大漆的香味，叫人着迷；大漆的色彩，让我想起春天，让我想起蓝天碧海，想起秋枫晚霞，想起橄榄树林和深秋最深处的巨大银杏树，想起世界上所有的瑰丽。

我可以一整天不说话，坐在一张竹椅上，看我的朋友如何把一块纯朴的石头磨制成一方印章。长短宽阔，完美的比例。或者雕刻出神入化的印纽，或是一头栩栩如生的瑞兽，或是一波如云似烟的博古纹，羽化蜕变，就在粗糙的手指间完成。我会买下一枚，刻上自己的名字。我不光用在书画上盖章，我还常常将它拿在手里，轻

轻把玩，细细打量，让它日益油润，给它裹上时间的宝光，如此，它似乎有了生命，似乎有了灵性，那蹲踞在石头顶端的瑞兽，也似乎真的活了起来，弓一弓背，抬一抬腿，眨一眨眼睛，好像要开口说话，讲神兽的故事，说寿山石可圈可点的前世今生。

或者就去古玩市场，淘几方旧印，运气好的话，或许能淘得一方陈大煜的名印，或许是一方天心阁闲章。古肆冷摊，与古人相遇，那是何等的快乐！灯下摩挲，石头竟有体温，印文仿佛耳语，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古人，啊呀呀，岁月的鸿沟，想象只要轻轻一跃，便回去了从前，来到了今天。

怎么不是呢！我当然会常常去三坊七巷徜徉，在宫巷看到贵为江西巡抚的沈葆楨当街卖



字。花厅西边，他的“一笑来”纸铺，自题的鬻字润例赫然在目：“写对联一，兼装潢，钱四百枚。写团扇、折扇、小楷每柄四百枚……”我上前求字，他捻须而笑，墨浓笔饱，另书“累美轩”慨然相赠。

又在南后街书肆，邂逅梁章钜。他真是个书画鉴定收藏的行家里手，欣赏他的所获所藏，艳羨不已之外，说长道短，相谈甚欢！

在光禄坊竟然还偶遇郁达夫，这位清雅消瘦的大作家，寓居福州南台青年会四楼，竟写了

《记闽中的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等美文六篇，他动情地写道：“午膳后登乌石山绝顶，俯瞰福州全市，及洪塘近处的水流山势，觉得福建省会，山水也着实不恶，比杭州似更伟大一些。”还说闽江“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弯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河，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赞美若此，真是爱福

州爱到了痴迷。写文章意犹未尽，他还在给王映霞的信里说：“福州风景好极，远胜富春江上。纪游文字在《宇宙风》上陆续寄去发表了，你可曾看见？”

三坊七巷，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宋朝以来，竟有那么多的名人雅士在此居住，它是一座小而博大的文化城，是一座魅力无穷的名人博物馆。我自然无法抗拒自己的脚步，常常会去那里游荡、朝圣，鬼使神差。不仅去看严复儒雅的手迹、林则徐赏心悦目的题匾，也在那里感受活泼泼火辣辣的市井气息。鱼丸、锥栗、锅边糊、冰橄榄，各种吃的，牛角梳、漆镯、油纸伞，各种用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男红女绿，在榕树下桂子前自拍他拍，笑语欢声，天上人间。其实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城市都有，北京的铜锣鼓巷、成都的宽窄巷子，还有我家乡苏州的山塘街、平江路。然而即便是文脉兴盛的苏州，也没有三坊七巷这样的奇观，这里的每一幢宅子，几乎都跟名士相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造就了这种局面呢？

我终于真的来到了这个到处飘荡着茉莉花香、到处悬挂着“福”字的城市。我被三面环山的城市搂入怀中。我在这里看山看海，看福州青翠的白天和缤纷的夜晚；我在三坊七巷流连，仿佛穿梭于时光岁月；我品尝各种美食，那是上天对福州的恩赐，我还去古玩城淘到了一个心爱的黄杨木雕小狮子。它在一家古玩店里小得几乎看不见，但我还是有缘发现了它。虽然只有指甲大小，却雕得神态威猛生动，刀刀爽利，叫人爱不释手！尤其难得的是，它还是上了天然大漆的，虽然历经岁月，红漆依然如火似霞，充满力量、喜气洋洋。

福州你好！你是一块真正的福地！你的山山水水、你的一草一木、你的每一幢建筑，都是一个个温暖的福字。连我这个被你拥入怀中的异乡凡夫俗子，也成了一个最美的汉字“福”——在今天，在福州。



你好，第六区

建 梅

—

“古槐、青山、三溪、湖南、江田、漳坂、松下、鹤岭、洞湖、蓝田、岭南、潭头、枫林、岱西、梅花、首占……”这是旧时长乐县志当中提到的隶属于长乐各个乡镇的名称。有的已经

改变，大多沿用至今。从这些充满了文雅气息与美好意象的乡镇地名当中就能领略到“长乐”这个滨海小城所蕴含的古朴气韵。

“长乐，长乐”这个缘于《诗经》当中“长安久乐”之义的美好字眼，建始之初便寓示了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灿烂文化与美好未来。

实际上，行走在今天长乐城关，和走在中国



其他的城市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高楼、街道、穿梭的车流、正在修建的地铁工程与围挡、等待拆迁的已经无人居住的空楼以及繁华热闹的商业新区……在全国任何一个县城都能看到的景象，在长乐也可以看到。只有走出城区，半小时就能到达的辽阔蔚蓝的海岸与沙滩以及星散在海边宁静而古雅的村落，才展现出这个滨海小城独有的清新韵致来。

那些被群山所环绕庇护的小村镇，宁静优美的村庄，田畴中旁若无人甩着长尾吃草的牛儿以及群飞的白鹭，村与村之间平坦的公路及富裕的长乐村民们修建得风格各异、有如西方宫殿一般的民居……既有着都市的现代气息，又有着安宁祥和的古典乡村之美。

长乐，这是一个让人很容易记住的地名。“文坛祖母”冰心一生都以祖籍长乐为傲，她向世人介绍自己都说来自福建长乐。而冰心的爱的哲学也为故乡这座城市增加了温婉的一面。

如果再往历史深处追溯，还有更多深沉的爱意充满着这座城。

西晋时期的董奉以医药救助世人，病人无须付酬金，仅植杏树于后山，久而久之竟有杏树7万株，蔚然成林。以至于长乐——这座以爱为名的城市自古以来都氤氲着一股杏林的芬芳，其中所暗含的对人世间的柔情与博爱，至今是医者所向往和追随的至高境界。

若看过凡高经典名画《开花的杏树》，便能想象杏花满枝该有多美；7万株，杏花开满山冈，

何其壮观！后世为纪念仁医，将此山命名为董奉山。如今虽然已经难以再现史上胜境，但长乐已经将董奉山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园内重建董奉草堂。堂前平畴万亩，后有杏山以峙，天朗气清，清风过处，确是福山胜地。

由此，这座城市带着这份厚重的温情一路发



登文古道

展繁衍，引得宋代如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在人生的低谷之时选择此处栖居，几经盘桓，并为这个城市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位于长乐潭头镇二刘村的晦翁岩，曾是朱熹教学读书之处。在这里，刘家二兄弟刘砥、刘砺侍奉朱熹若至亲。

朱氏膝下弟子众多，刘家二兄弟及众所周知的长乐青山人黄榦，都是这个城市夜空中闪亮的星星，引领和照亮了古往今来众多学子士人探索真理与未知的漫漫征途。

一条向海延伸的登文古道，是旧时学子们艰苦求索的见证，也是他们求取功名后反哺桑梓的写照。《长乐县志》记载：“登文渡，在文石澳登文道头，湾泊潭头港。由闽安镇一百二十里至大桥户部前。明万历年间，各乡文人捐资修砌，因名登文。自绅衿来往及儒童上省应试不用渡钱。”那条青石铺就的小小古道上有多少送别的眼泪与期盼，就有多少志得意满的春风拂面。海水起伏，涨潮时，古道隐去不见了，落潮时，狭窄的石道

又显露了出来。当年的儒生上省应试线路便由此开始，人生的命运起伏也自此小小的渡口展开。

地处东南沿海，远离中原，免不了向海求索。读书致仕，考科举求功名是一条路；冒险拼搏，转向大海讨生活也是一条路。长乐人崇文，但也重商，郑和舟车远航各国首开海上交流贸易之先河，后代长乐人便踩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冒险之旅。400年前，长乐的先民们就跟随郑和舟车远行至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近代长乐乡民们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欧洲、美洲各国。在美国的唐人街，长乐乡亲建立起一个属于他们的异国家乡，街上常常听得见他们用地瓜腔福州话攀谈家常，荔枝肉、佛跳墙也成为中餐馆必不可少的家乡味道。在欧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长乐移民通过学习与奋进跻身当地主流社会，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且不忘桑梓，纷纷回馈家乡建设，与家乡人民共同打造起一座日渐崛起的新城。



杏林春暖



晦翁岩朱熹读书处



长山湖一瞥

二

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发展史一样，长乐这座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由简陋的农耕社会向城市化的转变。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去回溯一个城市的发展线路，依靠着古人文字中为我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可以搭建起一个城市发展的具象过程，或许也能找到这个城市几千年的前世今生。

如果时间是一段可以感知的线段，我们在它的每个节点标记一个印记，可以发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自唐宋至明清的几千年里，城市发展的速度不过是原始与朴素的点滴积累。自唐建城至明嘉靖年间，也不过小小的一方城池，方圆仅里许。城门、街道这些标志着城市的基本要素的东西并不完备。

长乐六平吴航头，自唐代始建制，就是今天长乐城关的发源地。到了明代，稍微有所拓宽，但整个城市规模也很小，方圆不出一里。后来时常加以修葺，仍然狭小。到了明嘉靖年间，因为

倭寇屡禁不止，地方官上书朝廷拨款拓城。彼时“城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周千四十五丈有奇”。民国时期黄展云、王伯秋等留洋的知识分子在长乐实验自己的治世理想，按照西方文明探索和建设一个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行走在如今的营前模范村、长营大道上，仍能感受当年探索者的付出和勇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乐城市的发展与建设犹如进入了快车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乐城区仅9街38巷，街道狭窄，多属黄土石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季泥泞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历年城镇总规划的指导下，新城区的住宅、公共用地、道路绿化、给排水、电子、电讯等建设都作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老长乐人应该还能忆起旧时的河下街，一张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上，河下街的两旁是两层小楼，街道中间挤满了卖菜卖水果的小商贩。居民们推着自行车，侧身其间，免不了拥挤与杂乱。

改造后的河下街行人相对稀少了，小商小贩规范到了专门的菜市场，街道整洁有序，也能见到小汽车行驶其间。

而另外两张拍摄于同一角度的滨河景观更能说明这些年的山乡巨变。改造前沿河一带是参差错落的低矮民房，多为泥土墙面，上覆青瓦，极少量的砖石结构的小楼在一堆低层建筑中显得鹤立鸡群。彼时河滩尚未治理，居民污水直接排入河道，仅从画面上似就可闻到河水黑臭。20世纪80年代改造后的河滨一带，规划齐整的楼群，色彩风格统一，河岸可以清晰地看到休闲的步行道、小广场、路灯、道旁树等现代城市的配套设施，展现出改革开放之后长乐城市全新的文明程度及精神风貌。

三

如果说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长乐的发展都是以时间为线性的，那么到了当下，这座城市如同裂变，发展速度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身在外乡的长乐人，尤其是多年身处异国的华侨回到家乡都感叹，长乐的发展和变化令他们太吃

惊了。

600年前郑和舟师在长乐停泊，奏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宏阔的乐章。600年后的今天，长乐依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枢纽与港口，只不过，它已经不止局限在海路上——位于漳港的长乐国际机场，已被国家民航局确定为“海上丝绸之路”门户枢纽机场，发挥着连接世界与福州的窗口作用。

2005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迎来了通航史上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千万人次的时刻，成为我国第25个千万级机场。为了满足日渐上涨的旅客吞吐量，机场所在的漳港街道、湖南镇、飞行区按照4F指标，在现跑道东侧1920米处新建长3600米、宽60米的第二跑道，并在现有航站楼东侧新建第二航站楼。待机场二期建设竣工，长乐机场将在现有的规模上扩大一倍。依托着空港海港优势，长乐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丝”枢纽城区。

作为进入福州的门户，第一站的长乐展现给八方来客的将是什么样的面貌？

距离机场不到10公里的东湖已经在2015年的全国青运会上亮相了一把。作为水上运动的主





赛场，东湖的美令观者过目不忘。

沾染了蔚蓝色海水的纯净与深邃，又多了几分湖水的宁静与安详，美丽的东湖，湖面如丝绸一般洁净熨帖。白鹭翻飞的湖面上时常有健儿们进行皮划艇训练。得益于长乐东湖水质及环境的优良，大东湖已成为全国皮划艇运动永久训练基地。

“东湖”，不光是这一片湖水的名字，它所在的整个小镇也名为“东湖小镇”。这是位于长乐江田、松下、潭头、文武砂各镇交界处的滨海新城的核心区。为了响应国家打造生态小镇的要求，福州滨海新区核心区域以小镇形态建立了一个充满都市田园风情的新型社区。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五区叠加——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名词，以及诸如“数字、网络、VR、

互联网+”等时髦新词通通向人们展示着东湖小镇靓丽外表之下的新贵身价——修建得如同在科幻电影中才有的炫目的高楼、宽敞光洁的干道、走廊、公园、绿地……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亮得耀眼。

小镇的美令人赞叹，她的智慧则是内在的。

还未走进家门，就能操控智能家居，自动开合窗帘，根据你的心情调整灯光颜色；驾车外出，能在智能终端的指引下，轻松快捷地找到停车位；只需拨打急救电话，智慧医疗系统就会立即分析出患者的所在地，在车载导航系统的引导下，急救车迅速驶往目的地……这一切，都全部指向新型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以人为本。

在这样的科技保障下，全球知名的数字行业大咖都到长乐落脚。在东湖地标性建筑“两朵云”之“商务云”大厦入口，一些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高新企业LOGO密密麻麻地占掉了大半面墙：阿里、360、暴风影音、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盘古集团、中国联通、清华大学、中国船舶等等大型企业入驻长乐科技园。这一方面宣示着企业抢占福州滨海新区的商业敏感，另一方面也肯定了长乐这些年作为“数字福建产业园”孵化出的卓越成效。

四

2017年11月6日，大概是长乐市民难以忘怀的一天。很多人早在几天甚至几个月之前就已



东湖小镇智慧中心



东湖皮划艇健儿英姿

经来到原长乐市政府大院门口，跟挂着“长乐市委、市政府”的牌匾合影，要把这历史性的一刻记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有不少市民们纷纷晒出早年在长乐县委、县政府门口所拍的黑白老照片，两相对照，既可以看出整个城市发展变化的惊人速度，又可以感受到作为长乐人，这些年所经历的时光更迭、沧海桑田。

这个靠海的城市曾经经历了无数的行政上的变迁，由县为市，现在成为福州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新区——第六区。

“大福州”“滨海时代”的规划，使福州从滨江城市变成滨海城市，把浩瀚东海揽入福州城的怀中。有了福州市、福建省乃至中央的政策支持，长乐区的发展势必如同重力加速度一般，飞奔向前。如果我们还记得那条漫长的城市演化的时间线，如果我们继续把一个城市的发展节点标记到这条线上，我们会发现，这个城市的变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集，都要急速，都要令人惊

叹。

说起历史上的吴航古城，或许会让人想到医圣董奉故里盛开的朵朵杏花，也会想到理学家朱熹行迹下的雪泥鸿爪，还有“以爱为信仰”的作家冰心笔下的温和而宽厚的海的怀抱……而成为福州滨海新城核心区的长乐新区将提供给世人更多的想象：是蔚蓝大海下中翻飞的鸥鸟与嬉戏的家人，是日新月异的科技所提供的数字化优质生活，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用画笔绘制的动漫新城，是高远的天空中腾空而起的机翼与越来越多的属于这个城市未来的展望……这一切都已经在来的路上。长乐城市的发展也如同一架振翅飞向蓝天的大型客机，前面经历了启动与滑翔的起步阶段，此时已经稳稳升上了蓝天，乘着政策的东风，开启了光速之旅。作为身处其间的百万长乐儿女生逢其时，何其幸运。

未来的蓝图正在眼前徐徐展开。你好！福州第六区。你好！新城长乐。

家住金山友是兰

章 武

—

众所周知，仓山区所在地，是闽江和乌龙江合抱起来的南台岛，其地形地貌，状如双龙戏珠。但南台岛的西北端，从前并不属于仓山区管辖，在清代，为淮安县的凤岗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又属于闽侯县的建新镇。凤岗也好，建新也好，都是土壤肥沃、水源丰沛的鱼米之乡，再加上东北边的鼓山挡住了来势汹汹的台风，闽江口的暖湿气流又沿着峡谷徐徐吹入，于是，这里四季如春，又成为与漳州百花村、漳平永福并称的全省三大花乡之一。20世纪中叶，陈毅元帅来建中村百花场视察时，就曾以诗赞曰：



金山新区 王贤冰 / 摄

“东西南北中，好花在建中。”

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自然成为福州市开发新区的首选之地。于是，20世纪末，当市里吹响“东进南下”的号角时，这里就并入仓山区，成为可容纳30万新市民的金山新区了。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走进南台岛，只见高盖山、长安山、九曲山、清凉山、飞凤山和妙高山，哪有金山呢？是的，所谓金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兀立在乌龙江江心的一块大石头，石头上有寺，有塔，有大榕树，酷似江苏省镇江市长江中的大金山寺，故人称为小金山寺。长江上的大金山寺全国闻名，有关法海和尚水漫金山围困白蛇娘娘的传说、抗金女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中秋夜苏东坡与高僧佛印在妙高台赏月填词的佳话，妇孺皆知。乌龙江心的小金山寺虽然名气不如它，但也有抗倭名将张经在此读书、三一教祖师林龙江在此隐居、明代尚书曹学佺在此首创闽剧“儒林班”的种种传说。大旅行家徐霞客曾慕名来访，留下唱和诗，可惜却把日

记体的游记弄丢了，如今，我们已无法从他笔下领略小金山寺的古早味了。

好在金山这名字很符合当代人祈福盼富的心理，我猜想是市里讨论新区命名时，有位领导灵机一动，就地取材，信手拈来，于是，“金山”新区也就金光闪闪，大放光芒了。

二

我与金山结缘，事出偶然。那是2002年，年届六十、即将退休的我，忽然接到时任福州市文联主席、舍弟章汉的电话，说市开发区领导，正请他为金山首批开发的“金山碧水”十大楼盘命名，你不妨来此看看规划图，说不定能为晚年定居预选一套好房子呢！

古人云：择水而居。能在双江合抱的宝岛上养老乃至终老，自然求之不得。于是，我和老伴立即前往一探究竟，得知文思敏捷的章汉以花乡为主题，已为环绕“榕城广场”周边的“金山



闽江公园南园

碧水”十大苑各取芳名为：翠榕苑、傲梅苑、采菊苑、友兰苑、紫竹苑、舒柳苑、碧藕苑、风荷苑、雨桐苑、醉棠苑。其中，每个苑名各有一句古诗，友兰苑源于陆游的“家住江南友是兰”。

一听见友兰苑，与它同名的老伴汪兰立即大感兴趣，再查蓝图，发现该苑地处榕城广场与金山体育场之间，金祥路、金榕路与未来的地铁2号线在此交会，中间又有一条小河——因连接闽江与乌龙江，故称横江，呈优雅的S形穿过，横江对岸，就是福州三中金山分校的大操场了。其背后，据说还是大医院和大商场的预留地。如此榕荫如盖、花香遍地，既有水声潺潺，又有书声琅琅，交通便捷、文教体卫商设施俱全的宜居之地，自然让人一见钟情，于是，我俩立即预订了友兰苑中一套临水的复式楼房。

2004年，62岁的我，刚办完退休手续，就乔迁友兰苑。新居最让我满意的，是有一间单独的书房；最让汪兰倾心的，是有可以种花的大露台；最让孩子们兴奋的，是顶层的阁楼里还可摆放乒乓球桌。新居唯一的缺陷是没有电梯，但当年，健步如飞的我，双手拎着4个大花盆上6楼，仍然面不改色气不喘，对此全然不在考虑之列。

三

转眼间，我已在金山享受了13年安居乐业的生活。

头3年，我经常与老伴骑自行车四出赏花、

买花。那时，全金山半是工地，半是尚未拆除的苗圃、花场、林地和池塘，花农们见我们爱花，都视为知己，一边以最低价卖我榕树、三角梅、罗汉竹与红、黄玫瑰，一边又免费送上大把的时令鲜切花。建中村的李嫂最慷慨，她还就地挖出槟榔芋头让我们尝鲜。麦浦村的文友王启生更是热心，他得知我们要在大露台上种花，立即运来一拖拉机调配好的泥土，外加两棵马来西亚国花大红色扶桑花的种苗。从此以后，我们家就有了小小的空中花园。有一天，我和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外孙女妞妞认真数了数，花卉的品种居然已近百种，其中半数为各国的国花，于是，我在《福建日报》上发了篇散文《花的联合国》，当天就被中国作家网转载。

其实，金山的住户，户户都在绿荫里，家家都在花丛中。为保存花乡传统特色，政府十分重视在规划中留下大片土地和水面作为公园，如闽江南岸的闽江公园南园、乌龙江北岸的乌龙江湿地公园，中部的金山公园、劳动者公园及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公园等等。前几年，还把原在台江的市花鸟中心市场也整体搬迁过来，扩建为市园艺花鸟工艺品综合市场。于是，本是花乡的金山就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了。我家北靠的榕城广场，说是广场，其实也是公园，共种有88棵榕树。我刚搬来的当年，它们只是身材苗条的英俊少年，如今，“十年树木”，都已长成高冠入云、长髯垂地的绿色大厦了。有一天，我跟厦门女作家陈慧瑛闲聊时，说我写完《一个人与九十九座

山》，还想写《一个人与八十八棵榕》，一向爱给别人当预言家的她，立马说：八十八、九十九，都是吉祥数字，你能写出来，准定长寿！

说得也是，大凡长寿之乡，多在青山绿水处。金山亦如是。以我家为例，我母亲今年93岁，我岳母今年98岁，都堪称人瑞。我自己入驻金山3年之后，不幸在腰椎骨髓里发现肿瘤，且非良性，后经名医指点，决定暂不手术，静观其变。好在这一观，就是整整10年。也就是说，从65岁到75岁，我带瘤生存，在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情况下，与其和平共处了整整10年。这10年，我虽然下肢渐渐乏力，行走不便，不得不借助拐杖、助步器和轮椅出门，但能吃，能睡，能打字，我心无旁骛，潜心写作，出版了6本个人专著，还参加省作家采风团，走了50多个县，写了50多篇纪实文学，堪称人生中最单纯最快乐最有收获的第二段黄金岁月。曾有记者问我：你为何如此幸运？我回答说：是金山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好花好树好环境，让我心态好，笑口常开，延年益寿！

四

在金山住久了，方知这里不仅是花果之乡、长寿之乡，也是科甲鼎盛、人文荟萃之地。这一点，从现存的一些地名就可看出来，如状元街、尚书第、三十六宅。状元，指的明代万历年间的状元翁正春；尚书，光是明代的洪塘一村，当过

尚书的就有翁正春、张经、曹学佺三人。所谓三十六宅，实指36个村庄，只因村村都有达官贵人盖起大宅院，故不叫村，不叫庄，也不像闽南人爱称厝，而是像北方人那样尊称为宅。

就以我常去买花、闲逛的刘宅为例吧！其村中有座规模宏伟的刘氏宗祠，祠中设有“五忠府”“八贤堂”和“名人馆”。“五忠府”，祭的是宋代刘彝、刘子羽、刘琪等5位坚决抗金的忠臣；“八贤堂”，祭的是宋代刘藻、刘康夫等8位学者，堪称儒学世家；而“名人馆”所祭的近现代刘氏精英就有：甲午海战英雄刘步蟾，黄花岗烈士刘元栋、刘六符，民国海军总司令刘冠雄，参加长征的红军将领刘俊英，到南洋开垦沙捞越诗巫的第二港主刘家洙……令人难以置信，光是刘宅一村，就有如此之多的英才俊杰，整个金山三十六宅历史文化积淀之深厚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按本地习俗，凡七品官以上的大宅门，其门边都可加砌两扇八字墙，而金山古宅中的八字墙，随处可见，一点都不稀罕！我常想，作为一个文化人，能与这么多前辈贤达同居这一方水土，也就不枉此生了。

有句民谚：“凤岗里，三十六宅，走到你眼珠子老翻白。”意为村庄多，房子多，道路纵横，河港交叉，加上树木繁翳，外地人来此寻亲访友，往往如入迷宫，分不清东西南北，只能干瞪眼。我和汪兰骑车在卢滨村闲逛时，就曾经在果林和花圃中绕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不知不觉又绕回原地，老两口四目相视，不由得哈哈大笑。

但如今的金山，除小金山寺及刘氏宗祠那样的名胜古迹得以保存之外，原有的三十六宅，已大都消失在成片成片的高楼大厦之中。对此，我一边庆幸时代的进步，另一边，心中又难免依依不舍，怅然，惘然……

五

好在与此同时，原先闭塞、混乱的交通状



金山大道旁的木棉花和榕树

况也已成为历史。有人说，美国旧金山的交通地图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地图，就像是一张旧报纸揉成一团踩在地上再摊开来那无数杂乱无章的绉褶一样。但福州的新金山交通图，却好比一个围棋盘，所有的粗细线条都纵横有序，经纬分明，是全市路网最细密、交通最顺畅的地方。不仅如此，市里不少主干线的公交车还把始发站和终点站设在金山，因为这里地盘大，规划好，有足够的停车场供它们夜间停泊休整。每逢节假日，老城区里到处车满为患，但金山这边，除了浦上路，似乎很难看到堵车现象。今后，穿越金山的地铁2号线通车之后，进出就更方便了。

说起浦上路，那是金山的主干道之一，由于三家城市综合体——即万达广场、乐都汇和爱琴海在此一字儿摆开，使这里后来居上，一跃成为福州市最时尚最繁华的商业街，尤其是自驾车的年轻夫妇，每逢节假日之夜，总想带孩子来此看一场电影，品一餐美食，买几件时装，并让孩子们在众多儿童乐园或人造滑冰场上疯玩一阵。尽管这里有全市最密集的地下多层停车场，但地面上车水马龙，一时为之堵塞，也就可以理解了。

金山，作为要吸引容纳30万市民的新区，除了交通便捷、商贸繁荣之外，还必须满足市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愿望。何况，这里自古就是尊师重教、英才辈出的福地。因此，大投入、成规模、高起点、上档次的文教体卫配套设施，不但必不可少，且还应该不断走在全市前列。

就拿榕城广场及其周边来说吧！幼儿园有：金山幼儿园、小金星国际双语教学幼儿园；小学有：市重点小学金山小学、区实验小学；中学有：省重点中学的福州三中金山分校（金山中学），如今已拥有初高中 3000 名师生。它的大操场与我家客厅遥相对望，每逢周一早晨，我的老母亲总喜欢站在客厅的大玻璃窗前，观看其升国旗仪式，3000 名师生列队肃立，那场面何等壮观！有一天，雨后初晴，有两道弯弯的彩虹，正巧跨过大操场，落在钟楼与游泳馆之间，妙景天成，让我拍成了一张堪称全市最美校园的好照片。

让我们回到榕城广场本身。由于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既无法放弃应试教育，又开始重视素质教育，于是，拥有大量商住房的榕城广场，就渐渐成为仓山区乃至辐射全市的中小学生课外教学中心，各种辅导班、补习班、才艺培训学校，如雨后春笋，如众星捧月。站在广场中心的喷水池旁，举目四望，便可发现环广场两圈的高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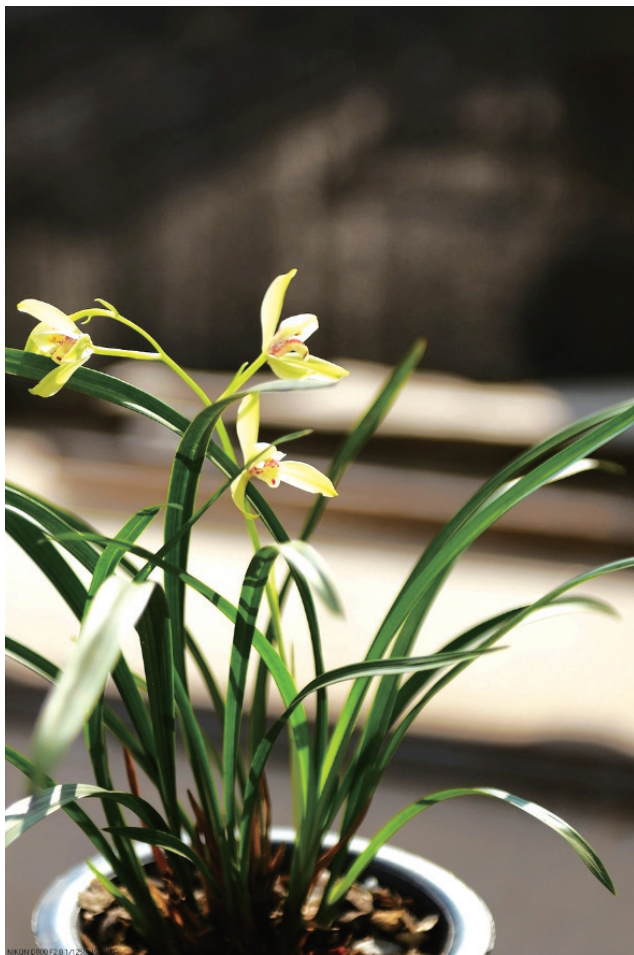


金山夜景 颜家蔚 / 摄

上，全都是各种引人注目的招牌：作文、英语、数学、绘画、书法、摄影、声乐、钢琴、手提琴、吉他、古筝、古琴、围棋、街舞、瑜伽、跆拳道、婴儿游泳、幼儿舞蹈……可谓异彩纷呈，各领风骚！每逢节假日，这里涌来无数身背书包、画板或琴盒的师生，而许多陪同的家长，则静静地坐在长廊里守候，这就是广场白天里最典型的风景，与夜晚广场舞的喧闹与热烈形成强烈的反差。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城区，它还要满足人生各阶段，包括生老病死的种种需求。令人振奋的是，全市规模最大、床位最多的妇幼保健院和养老院都已在金山开建，位居全省三甲医院之首的省立医院，也在金山开办了南院（又名金山医院）。而福州殡仪馆原本就在金山白鹭岭，慎终追远，自然不在话下。

我作为一个多病缠身的古稀老人，是省立医院南院的首批受惠者。该院占地面积之大，已居福州市各医院之首，未来的床位数将超过鼓楼区的院本部。目前，院本部的百名主任、副主任医生，每人每周都有半天时间来南院门诊，而南院的住院部，又以楼房之宽敞、设施之先进、医疗团队之年轻精锐、服务态度之良好周到，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好评。今年中秋节早晨，我正迷迷糊糊躺在南院第六病区的病床上，突然，一片白云飘到眼前，从中降落一只红通通、圆滚滚的大苹果。睁眼一看，原来是护士们为我送上节日的祝福。我一激动，当场就在手机上写了一首诗，诗



的最后几行为：

像春雨，浇灌我心中快乐的大树；
 像春雷，震醒我身上康复的因素。
 于是，我要坐起来，站起来，跑起来，
 让枯枝抽出嫩叶，让老树绽放新花，
 让生命再度迎来春的明媚、夏的绚烂！

六

在中国诗史上，宋代的陆游是最喜欢梅花的

诗人，与此同时，他也把兰花当成最好的朋友。前文已经说过，我家所在地友兰苑就取自陆游的诗句“家住江南友是兰”。他笔下的江南，到底是长江之南还是钱塘江之南？我尚未仔细考证过。但友兰苑地处闽江之南，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我常套用此诗，把友兰苑说成是“家住金山友是兰”。也就是说，凡是来金山的朋友，都是盛开的兰花，绿叶葳蕤，清香飘荡……

13年来，来我家以文会友者不少，其中，光是荣获过茅盾奖和鲁迅奖的作家就有5位，他们是：铁凝、南帆、吕雷、陈世旭和刘兆林。种花有道、来我家指导汪兰种兰花的作家也有3位，他们是：永泰的郭永仙、福州的张茜、德化的张晴雯。其余的文朋诗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光临我家更多的，还是金山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是：装修工、搬运工、家用电器修理工、家政服务钟点工、上门服务的邮递员、送餐员、快递员以及帮我推拿的半盲人师傅……总而言之，他们都是支撑新区正常运转、与新区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第三产业服务大军。在我眼里，著名作家也好，普通劳动者也好，都是我的贵客，都是我的好友，也都是一朵朵、一丛丛盛开的兰花啊！

如今，采风团的团友们来啦，仓山和金山的土地上，立马又有一大片兰花盛开怒放，他们的兰心蕙质，他们的生花妙笔，必将为闽江与乌龙江之间的这一片热土，增添更迷人的色彩，发送更沁人的芳香！

潮涌三江口

丁 洋



三江口规划效果图

目标。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福州新区的批复》，把福州新区列为第14个国家级新区，初期范围包括仓山区、马尾区、长乐市、福清市部分区域，规划面积800平方公里。2017年2月，福州滨海新城建设启动，69个重大项目，1500亿巨资投入。2017年11月6日，东海之滨的长乐，举行隆重的撤市设区授挂牌仪式，意味着福州跨入面江朝海发展的新时代。

5000年前昙石山人临海听涛；

千百年来福州人民凭海弄潮。

1992年11月，由福州市委书记倡议并组织编制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明确了福州“东进南下”的发展方向。2015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更明确了福州“滨江滨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

新时代，福州砥砺奋进，打开了海洋世纪的大门。

“东进南下，福州向海！”这是时下媒体的热门词。福州新区建设风生水起，大福州蓝图正在逐步“变现”。

滨海新城建设红红火火，长乐撤市设区又添了一把火。福州新城区与原有城区如何衔接和融合？另外，马尾新城的跨界联手，由谁承接？城市顶层设计师成竹在胸，早有谋划：

1992年提出的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就有伏笔，《福州城市总体规划》也有布局。马尾新城、滨海新城与老城区的边界接轨联通，就福州的城市格局看，三江口成为实现城市大融合的关键性节点——三江口片区应运而生！

三江口，是闽江、乌龙江、马江三条江的交汇区。福州有福州新区、海丝核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文明示范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五区”的战略机遇，正乘势而上。三江口片区肩负福州城市延伸重任，承接城区一路向东发展，促进实现沿江向海大福州的蓝图构想。

在福州新区规划的大局中，三江口片区作为大福州的城市地理中心，将有机连接东部马尾新城和南部滨海新城，成为福州新区的一个核心功能承载区。

作为福州新区的一个核心功能区，必须是宜业又宜居。三江口片区总体将形成“一心、一轴、一带、三片、三廊道”结构。一心，即行政中心；一轴，即北至鼓山、南至三江口的南北向中央轴线；一带，即滨江商务办公、文化娱乐带；三片，即北段壁头文化、体育、商务办公片区，中段行政、商务办公、文化综合片区，南段商务办公、文化娱乐、教育科研、居住综合片区；三廊道，即城门山——铁头山——闽江通

廊，南湖公园——闽江通廊，清凉山——闽江通廊。

三江口视野开阔，距离福州市中心较近，与马尾、长乐、闽侯地域相邻，地理位置极佳。周边还有马杭洲、道庆洲等鸟类重要的繁殖地，环境非常优美。三江口片区沿白龙江、乌龙江、马江，形成“三江六岸”，大开大合，将要成为自然山水与城市格局相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辉映的国际化滨江宜居新城区。

二

如果能透过时光隧道，站在历史的维度来看三江口，将感慨万千。

但凡三江口这类多水汇聚之口，都是风云际会之处。地形水势的天工造化，自然景观的奇特怪异，就是风生水起所在，人文传奇之地。

白龙江、乌龙江、马江汇聚之三江口，龙马腾跃，历来是福州、福建乃至国家江卫海防的要害之处。清朝自然也在此布兵设防。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在闽江南岸设立三江口水师旗营。不过，营址却是选择在乌龙江和长乐上洞江、琴江这三江的交汇处。满族水师营的建立，比洋务运动时期在马尾创办的福建水师要早150多年。马尾水师是近代化的海军，而三江口水师却是旧式水师。在中法马江海战中，三江口水师旗营广大官兵，奋力划桨，驾着古老的木壳船，使用简陋的武器，向法舰冲去，英勇杀敌。无奈

回天无力，死伤惨重。铁血悲壮，惊天地、泣鬼神。

三江口水师旗营也是我国唯一保留完整的清代军事城堡。营地布局似太极八卦，故称“旗人八卦城”。旗营整体建筑呈“回”字型结构，分12条街4条直巷，东西南北4个城门。旗营内各种设施完备，衙门、炮台、教场等一应俱全。

辛亥革命后，水师旗营逐渐淡化成为一个居民小镇，即琴江村。琴江村是福建省唯一的满族聚居村，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获得“福建最美乡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

如今，昔日生死战场的三江口，凤凰涅槃，成为新时代的建设发展热土。

三

仓山区委、区政府坚持高标准、高品位规划建设三江口片区，无缝对接新区各项规划，做好“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确保一张蓝图绘到



底。加速推动樟岚总部片区、梁厝片区等“六大片区”开发建设，全面加快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打通新区内外连接通道。加快推进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严复医院等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兴建一批重要供水、供电、供气项目，提高新区承载能力，倾力将三江口片区打造成为福州新区的核心区、先行区、示范区。

交通是区域发展的动脉。1993年5月，笔者撰写的《完善福州城市功能》，提出“城区道路在城市规划上要与新城区开发衔接，打通二环路，预置三环路”，当时市委书记看后做了重要批示。如今福州的城市道路建设已经穿越“三环”，进入“四环”时代。

道庆洲大桥，这是三江口片区交通动脉的重点之一。它起于福泉高速公路福州连接线下洋村段，以高架桥的形式跨越仓山区三江路、规划纵二路以及乌龙江，过江后沿长乐203省道、营融线布设，抵达长乐营融线洞头村，将与福州东南快速通道营前至滨海新城段衔接，全长6.82公



三江口水师旗营



青州大桥

从福州古城到滨海新城，一场影响未来的城市巨变正在发生。三江交汇，山水交融。三江口片区正在崛起，将成为推动福州迈向真正滨海城市的关键引擎。

为了三江口片区的崛起，在拉开片区开发序幕之前，福州市政府已经在环三江口一圈布下千亿规模

里，是福州第一座跨江公铁两用大桥。

有了道庆洲这座桥，明天，从三江口到东海之滨，只需要半小时的路程。这对于落实福州市沿江向海发展战略，完善新区骨架路网和乌龙江两岸城市组团之间的联系，加快推进福州新区与滨海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国际大城市，建设新城是一种趋势。新城建设能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而同时，江和海作为资源集聚的载体，城市沿江向海发展也是一种必然。三江口片区，以其特殊的地位，重要的区位功能，开创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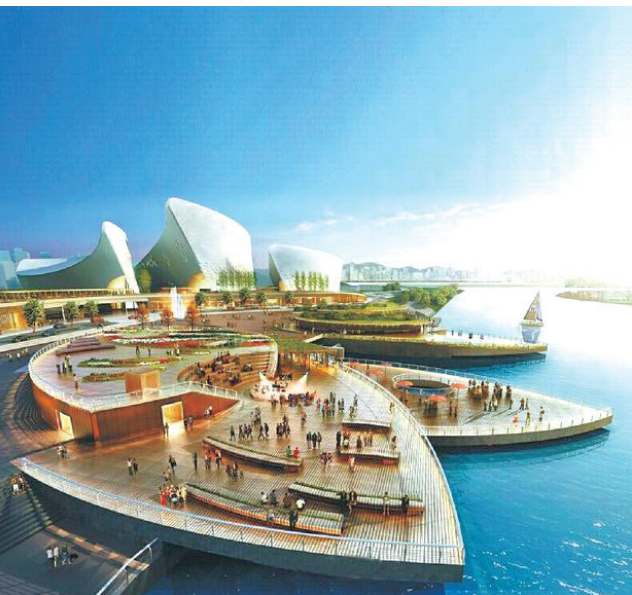
四

2017年，福州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的公共建设配套项目，而多条过江大动脉的加速建设也格外引人注目。在攻坚2017行动中，马尾大桥将于2018年全线通车；道庆洲公铁大桥也将提前动工……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马尾大桥、乌龙江特大桥、青州大桥形成一个合环，道庆洲公铁大桥的地铁6号线快速穿行其中，三江口片区成为滨海大福州的中心内环，能够在未来担负更重要的城市角色。

为了三江口片区的崛起，仓山区委、区政府努力为福州新区早见形象、早出效果先导示范。坚持“三个主动”：主动谋划，进一步抢抓新区发展机遇；主动担当，进一步推进新区项目征迁；主动作为，进一步强化新区工作保障。

为了三江口片区的崛起，围绕提升三江口片区投资形象、打造新区亮点的目标，仓山区结合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效果图



在建中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十三五”规划，主动对接福州新区的土地规划、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的总抓手，积极发挥自贸福州片区南台岛区块“溢出效应”，提前谋划利嘉国际商贸城、樟岚总部基地、东扩企业3号地、福州国际金融中心、华侨城帝封江项目等重大产业项目，快速提升全区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后劲。

为了三江口片区的崛起，仓山区坚持将新区民生列为头等大事，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确保新区民生项目建设提速。片区的城市框架已经拉开，配套设施逐步到位，新城面貌日新月异。如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融入福州市茉莉花元素创意的大型建筑，将成为福州市新地标性建筑，可举办大型电影节、音乐会、各类表演、临时性或永久性展览以及各种会议等活动。

为了三江口片区的崛起，作为福州市两大试点片区之一，三江口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城市像海绵一样有“弹力”，可有效吸纳、蓄渗和缓释雨水，增强城市的防涝能力。会展岛海绵改造提升、胪雷新城保障房、南江滨生态公园、清凉山公园等项目已完成。围绕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内河环境，三江口水系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如火如荼，9条内河已全面动工，今后沿河还将修建一批串珠式公园，供市民游玩休憩。传承历史，留住乡愁，林浦、螺洲、阳岐等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工作也在有序开展，将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重要人文节点。

……

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三江口片区建设热火朝天，一个高品质的城市空间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越来越清晰、明亮。

月上水乡林浦村

孟丰敏

林浦村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的水乡，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南台岛东北部。村外一弯月牙似的濂江，与闽江连缀如环，环中一岛即闽江会展岛。岛上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隔江与林浦泰山宫（宋帝行宫）正面相望。

濂江由西向东流，从鼓山大桥，经潘墩

路、南宋断桥、大小沙洲、泰山宫、邵歧渡（码头），至南江滨东大道止。站在断桥外的河畔，向东远眺，一幅月上水乡的画面。一泓清流，明瑟可爱，近处大沙洲与断桥隔江相望。洲上密植花木果树，稚绿娇红荫翳着老旧的柴厝，远望，一片浮云前的林外野人家。断桥桥墩两侧各卧一

株大榕树，均为树龄200多年的老榕，枝繁叶茂，密密实地裹住了断桥上的清代水神庙（马相公庙）。

断桥和大沙洲之间的河面，垂枝下停泊着两条扁豆似的杉木船，便于两岸往返。船身漆为蓝色，却已被岁月和河流洗得发旧，另一些杉木船则星星点点泊于岸边和古渡



林浦村

旁，阳光下，轻摇着波光粼粼的闽江水。小沙洲与邵岐渡斜对，树上泊满了白鹭，遥望犹似盛开的栀子花。河边聚集着大量的白鹭，不时凌空优雅飞舞，宛若洛神凌波微步。邵岐渡只剩几级台阶，模糊了800年前那段遥远而重大的历史。远一点，濂江与闽江的交汇处，中亘一桥，即南江滨东大道，连接了会展岛和林浦村，也拦住了高大的船只驶入濂江。天边，巍巍鼓山犹如一痕水墨，自然秀丽风光真乃人间胜景。

林浦又称作濂浦。据说濂为连，即最早聚居此地的连姓人家。浦即江。濂浦更名为林浦，因村内的林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明朝诞生了林元美为首的“七科八进士”，林瀚为首的“三代五尚书”。这是隋唐开科取士1400多年来的盛况，令林浦成为一座旺福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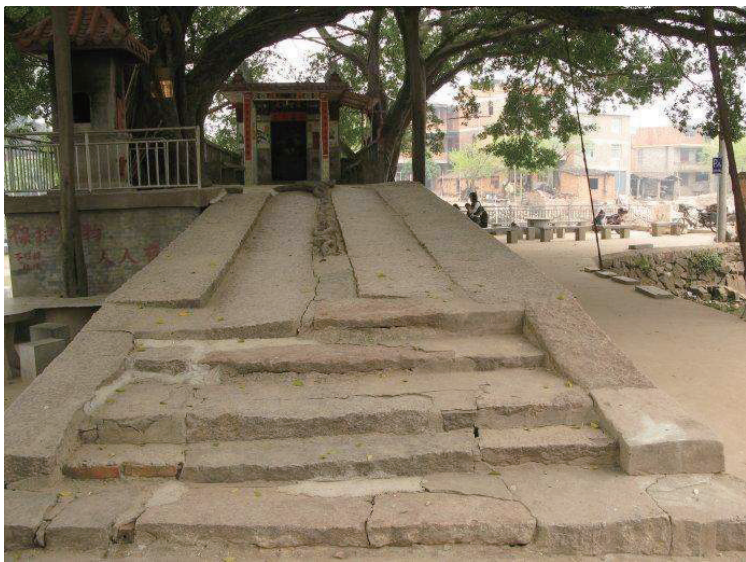
林浦为何如此旺福呢？一抹淡金色的冬日

阳光从我的书房窗前掠过，似乎照见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南宋。那时，福州对外贸易繁荣，已是东南大都会，距皇都临安最近、离中原战场最远，成为中原人士心目中的“有福之州”“世外桃源”。大量西外宗人（皇族宗室人员）因此迁入福州生活。根据《淳熙三山志》卷7公廨类“西外宗正司”条记载：“绍兴三年诏西外宗正置司福州。”西外宗正司是管理西外宗室家族的，从洛阳迁至福州的开元寺太平院。这些宗室人员统一住在开元寺西南方向的敦宗院内。南宋153年间，福建建立了许多书院宣扬理学，考中进士者比北宋的2600人又翻了近一倍，有4544人，居全国进士总数前列。

绍兴三年（1133），对福州历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西外宗室人员从洛阳移至扬州、高邮军，最后确定迁至世外桃源的有福之州安居。



邵岐渡



断桥

他们坐船从东海进入闽江，在林浦村的邵岐渡上岸。当时林浦村已是一座富饶美丽的小村。村里有一座始建于唐朝的瑞迹寺。瑞迹寺旁有一块大石头，据说李铁拐下凡休息时，在石头上跳了两下，结果留下两块脚印凹陷，是曰“瑞迹”。“瑞迹”对南宋避难的宗室人员而言意味着神助的吉兆。

绍兴三年（1133），林浦村造了一座十分宏伟的大桥，且完全依照宋式桥梁建造工艺建成，堪称福州地区宋式平梁石桥最为珍贵的标本。这座桥由3条巨石并排铺设，每条巨石长9米。原桥长22米，宽2.7米，2墩2孔，桥孔宽8米。当年，这座桥为福州桥梁之最，在全国亦为罕见，比闽江万寿桥（建于1302~1322年）早190年，比河口万寿桥（建于1668年）早535年。如今，这座古石桥成了断桥，留下一个难解之谜。不少人好奇，如此偏远的小村落里，建一座全国

罕见的大桥，没有连接到大沙洲，又建在陆地上，有何用处？

当地老村民告诉我，断桥边的池塘，原是濂江，经过断桥底。朝代更迭，濂江日渐被人为填埋，形成今天的陆地。断桥被村民称作“风水桥”，乃因林浦村里有一座狮山，形似母狮，魁歧村北的山貌似公狮，林浦西北面潘墩村的球山像狮球，此三者形成“双狮戏球”之势，风水极佳。由于两“狮”之间有江水相隔，故特于江边建“鹊桥”，引对岸的公狮过江与母狮相会，以求林浦村兴旺发达。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南宋时期的濂江比现在宽阔得多，流水湍急，为了避免小船在江中倾覆，就兴建了大石桥，不仅能减缓河水流速，使江面平和，也利于舟行，同时便于百姓步行通往大沙洲。然困于资金和造桥技术有限，只能建到河中间，留待以后续建到大沙洲。福州仓山的万寿桥当年也是如此，由于台江和仓山之间的闽江江面太宽阔，1302年先从台江修建到中洲岛，1322年再从中洲岛建江南桥到仓山。

没等林浦的“鹊桥”修到大沙洲，南宋灭亡了，留下这座没有修完的桥，成为一个难解之谜。如今人们到断桥边，依然只能换乘杉木船渡河到大沙洲。断桥不再是鹊桥，公狮大概再没机会过桥与母狮相会。

此人间“鹊桥”的建造者是谁呢？断桥上石

刻文字记载：“巨宋绍兴三年，岁次癸丑，八月辛酉，朔二十六日戊申作，都管干林康、林元均洎诸劝首等。林应儿舍小梁三条，林应郎舍大梁一条。邵谦、僧光涌各舍小梁一条。”

林浦村最初的居民以疍民为主。北宋福州疍民对外贸易繁盛，成了富甲一方的海商，令福州成了“东南大都会”。当年，村内富有的疍民捐款建造一座大石桥不算难事。但是，断桥建造时间和西外宗正司设立福州时间吻合，或许与西外宗室人员迁入福州，从这里上岸有关，且石刻文字中提到了“都管干”三字，此乃南宋军队的官职。

当年，林军官带领富有的村民建桥，应是迎合官方和宗室要求，体现这座富饶村落的豪门气派。然而，南宋的“鹊桥”犹如南宋王朝的断裂，在一次地震中，因桥上的一段石墩落入江中，成了“断桥”。谁能想到，断桥不曾引渡南宋宗族从乱世走向太平，反而随着南宋灭亡，成了千古之谜呢？

断桥往东行，在泰山宫的河边有几级台阶，岸边浮着一小块覆盖着水泥的大泡沫，因为泡沫材质坚硬，犹似一个浮板，浮板一侧有铁栏杆防护。如果不是它浮动时露出与台阶之间的小缝隙，乍看之下，以为与台阶是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小码头。这块浮板也算是一只浮舟，方便村民过江去小沙洲，所以用铁链和缰绳系在台阶的铁栏杆上。那么，你能想象得到，这即是邵岐渡吗？它可是宋代福州一座非同凡响的大码头。

南宋初年，宗室贵族由此上岸避难求福，南宋末年，益王赵昷又由此上岸称帝。可惜，如此重要的历史古渡，福州史料中难觅片言只语。村民只叫它“码头”，不知它的名字叫“邵岐渡”，江边也没有立碑文说明。

宋朝，福州还有一个大码头是闽江边的上王码头，晚清到民国时称作泛船浦，即今天的泛船浦天主堂一带。明朝，福建市舶司正式在福州设立，琉球国来进贡的海船则停靠直读新港了，即今天的台江新港的“河口渡”。这三个古渡码头，见证了福州辉煌的对外贸易史。

离邵岐渡不远，南江滨东大道江畔，有一座炭色的葫芦状花岗岩石塔。古代，塔被视为水道的航标之一。由此确认，闽江畔的林浦村在水运发达年代，是一个盛名远播的富饶水乡，建造邵岐渡，便是供走海路的海商由此进出和停泊海船。

宋朝，福州已是全国造船业中心。福州工匠造船手艺全国一流，能制造“三千斛”的大型海船。或许，西外宗室人员来福州坐的海船就是福州造的。至今林浦村民还喜欢制造杉木船，闲来飘于濂江上赏景散心，或划船作水上运动。

林浦村能成为福建历史名村，与南宋末帝在此设行宫有关。那是1276年。而南宋留在林浦村的仿佛是一段混乱的足迹。但南宋并不孱弱，1233年10月，南宋统帅孟珙灭金抗蒙，增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但他去世后南宋朝廷便如正在倾倒塌塌的大厦，无可救药。1276年，在临安被俘的谢太后要求陈宜中等投降归顺。陈宜中却带

着年幼的二王出走，从林浦邵岐渡上岸后，驻蹕林浦平山阁，屯兵于平山，而后到福州城内垂拱殿（原大都督府衙署），立益王赵昰为帝，称为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加封广王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李庭芝、文天祥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福州府升为福安府，辖境相当于今福建省尤溪口以东的闽江流域和屏南、福安等市县以东地区，至1277年复为福州。

这个流亡小朝廷传檄各地起兵抗元。但陈宜中与文天祥政见不同，将其排挤。元至正十四年（1354）五月，文天祥把在梅州组建的军队带回老家江西抗元，初战告捷。而林浦这边，陈宜中又与陆秀夫、张世杰不和，内部管理一片混乱。

这个海上小朝廷流亡到广州时，端宗惊病而死，陈宜中便借口避走越南占城，留下张世杰和陆秀夫共同秉政。这时的文天祥军队因得不到张世杰等人的支持，势孤力单，且进攻江西又多方出击，没有统一指挥，久攻坚城，致兵力分散，终于失败，也不得不退到广州，上表自责，请求入朝，但不被获准。

南宋汉奸太多，大汉奸史天泽和长子史格、张柔与儿子张弘范都为灭宋立下“汗马功劳”。由于盗贼陈懿的出卖，文天祥在广州五坡岭再次被元军俘虏。关于这段历史，张弘范的墓志详细记载了他俘获南宋丞相文天祥、张世杰，灭南宋的详细经过。张弘范甚至在崖山石壁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但后来有秀才在前面加了一个“宋”字，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



泰山宫



西辕门

文天祥面对忽必烈的利诱，宁死报国。而陈宜中作为逃兵不知所踪，成为千古之谜，但林浦村民却因他当年开米仓济民而感恩，专门为他建“宋陈公丞相祠”。

有了南宋末年重要政治事件的铺垫，林浦村里多了一座泰山宫。此因端宗赵昷暂居林浦，村中平山阁此后更名为泰山宫，为福州迄今仅存的王都行宫。元朝时，林浦百姓为了保护泰山宫，将“泰山宫”改为“泰山庙”，却是国内唯一一座不祀泰山而祀宋帝的庙宇。泰山宫正殿中间塑着南宋开国皇帝赵构，左右塑着赵昷、赵昺；正殿右边是总管殿，门上悬挂“平山福地”匾额，据说原为丞相陈宜中手书，后来人们耻于陈宜中避走越南占城当了逃兵，而用辛亥志士林之夏手迹取而代之。殿内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忠臣。正殿左边是天后宫。泰山宫门前的青石坪是当年文天祥操练水师的练兵台。泰山宫两边各有一个牌楼，即左右辕门。西辕门往西的一条石板路，据说是当年小皇帝走过的御道街。如今石板路已成水泥地，御道街的路径也已改变。

村内还保留了不少南宋末年文臣武将留下的遗迹，比如陈宜中、文天祥题写的“还我河山”“薰风陇”“锦绣谷”等摩崖石刻。

林浦自深深地烙印了帝王的足迹后，便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气象。1103年至1895年近800年的历史中，林浦村共出了18个进士，可谓“全国进士第一村”。明朝村里光宗耀祖的“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两户人家，为村里留下



小皇帝走过的御道街

恢宏壮观的尚书文化遗迹：尚书里石碑坊、进士柴坊、林尚书家庙、林瀚故居、林瀚尚书墓、林瀚示裔孙摩崖题刻等。

这座旺福的月上水乡，值得学子来参观学习。2016年冬夏，我两次带孩子来林浦参观，看到保留完好的北宋濂江书院，明白了林浦人才辈出的缘故。北宋时期经济发达的林浦村已十分重视人才教育，兴建了这座两层木构的大书院，筑巢引凤，成为朱熹女婿黄榦的讲学处。朱熹来福州看望女儿女婿时也在此讲学，并题写了“文明气象”四字，成为书院的珍宝。

国中称君子，乡里遗高风

孙源智

—

在福州南台岛的东北隅，已存在了千年的林浦村，隔着濂江与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的高楼广厦相对望。由于濂江从村中经过，林浦又名濂浦。濂江也因为林浦村的关系，有了林浦江之称。千年历史已过，到底最初是江因村名，还是村依江名，竟是不得而知了。只有一道濂江水，把传统与现代隔于两岸，仿佛是在守候着千年林浦的悠

久记忆。

在历史上，林浦以南末小皇帝赵昞为期半年的驻蹕，和明代林瀚家族长达200年的四世科甲而著称。林瀚曾称赞潮阳人文，“谓其山川钟秀攸致固然，予则意其前人积累，迨今诚非一朝一夕之故。”此话放在林浦也是十分恰当，相比前者带来的一时荣宠，后者累世数代的文化积淀才是让这里成为历史文化名村的真正关键。

直至今今天，当你走进林浦村，村中的尚书里石坊、进士木坊，以及世宫保尚书林公家庙中蔚



林尚书家庙

为壮观的进士牌匾，还是能给人们带来最直观的震撼。村中有一副不知何人何时所作的对联，寥寥数语概括出林浦曾经的辉煌：“进士难，进士不难，难是七科八进士；尚书贵，尚书非贵，贵在三代五尚书。”

二

林浦林氏的盛名，历代皆有称誉。早在明嘉靖年间，就已经有了“南林北许”的说法，“南林”即“三代五尚书”的林浦林氏家族，“北许”则为“父子四尚书”的灵宝许氏家族，两家门宗仕宦，以科第禄位之盛为世所重。至清代，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将林瀚家族与宋代名相吕蒙正一族相比，称赞两家家风“风流笃厚”，“可为师法”。

林瀚为“三代五尚书”之首，是这一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人们有时直接以他来指代林浦林氏，如清人郭柏仓就说“闽中氏族之盛，首推闽县林文安公瀚”。林瀚的父亲林鏐是“七科八进士”中的第一位，因友人戴弘龄尝言，“林公历官知县、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鲜能也”，故有“林公四知”的佳话。林瀚是林鏐次子，自幼聪颖，秉承家学渊源，33岁时便高中二甲第三名进士。

登科后，林瀚仕途顺达，选翰林，授编修，迁国子监祭酒，转礼部、吏部侍郎，历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其间，他执国子监垂十载，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严而有恩，汲进贤才。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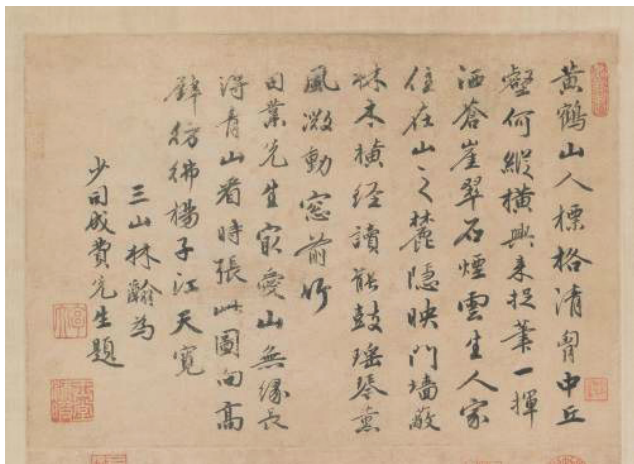
名列“后七子”的何景明就是得到林瀚赏识后，声名雀起，“海内犹凤鸣麟出，世人惊睹”。晚年，林瀚官拜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内行修洁，与林俊、章懋、张敷华合称“南都四君子”，海内咸重，位极人臣。

林瀚在当时也是一位风流人物。他仪表堂堂，时人描述他“长七尺，声若洪钟，美髯，再望之如仙”。他颇具豪气，嗜酒爱诗，同科进士张弼有诗赞道：“三山豪士林亨大，随处风流欠诗债”，“长安市上醉一石，仰观似笑乾坤隘”。对于他的诗，梁章矩评：“直掬胸臆，想见其人”，“擅长处正清空如话也”。林瀚还素有文名，善作八股文章，长于说理，慈溪姚夔“哀集明一代时文三百八十家，特推公为之首”，林俊称他“文平气顺，而一根于理”。林瀚又擅书法，且存世作品不少，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代画家王蒙的《夏日山居图》上，就有林瀚的题跋。

不过，林瀚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人格，其中以陈伯献的评价最有意思。陈献章说他：“贱



林浦村进士柴坊



王蒙的《夏日山居图》上林瀚的题跋

者即之，不知公贵；卑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贤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凛然不可犯。”林瀚家世代治《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林瀚之凛然不可犯与此似有同工之妙。平时，林瀚为人最是谦厚，宽宏大度，与众无违，不言人过。但当佞臣刘瑾弄权，把持朝政时，林瀚又正色独抗，态度坚决，以致得罪刘瑾一党，最终被勒令致仕。

三

林瀚别号泉山，在他 78 岁那年，兴化进士方豪作《泉山图》贺寿。方豪在序中对“泉山”有两解。一称“天下之至动者莫如泉，至静者莫如山”，以为林瀚“仁且知，夫子既圣矣”；二称林瀚生于泉山，“盖泉山之秀为之矣”。此泉山指的是林浦的甘泉山，方豪称“闽山水为天下甲，泉山又甲于闽”，显然是恭维之辞，但林瀚归心于

此，倒是毋庸置疑的。

林瀚生性热爱林泉，早在他做翰林时就已有体现。他曾作有一首小诗描写翰林苑的生活：“翰苑看新鹅，寒泉同一泓。影涵银汉洁，色借玉堂清。润物施余泽，烹茶解宿醒。辘轳风外急，时杂诗书声。”某个深夜，林瀚在一口新井中打水，烹茶以解昨日的宿醉。林瀚在诗中以清新的笔调描绘了他打水烹茶时的所见所听所想，有声有色，虽取材平常，立意简淡，组织在一起又显出一派自然闲适。

林瀚久居官场，随着年事愈高，退隐之心愈发迫切。他在给友人黄仲昭的书信中自言：“归心如注，弗克自己，旦夕当再上章，务求一退，冀得重挹高风于乡国，用罄平生，则为愿毕矣。”友人彭桓因事免官归田，林瀚赋诗以赠：“白玉杯浮蚁，青藜杖策鸠。棋弹花坞静，卷展竹窗幽。尽日闲如许，平生愿已酬。山中无限乐，物外更何求。”诗句中大有欣羨之意。

林瀚从 69 岁开始上书请求致仕，始终未获批准，直到 74 岁时，因开罪刘瑾被迫致仕。“为问濂江江上路，几人烟雨櫂归舟”，对林瀚而言，这样的结果既有些讽刺，却也算是因祸得福了。8 年之后，刘瑾伏诛，林瀚被官复原职，但仍准许致仕，归老林下。当时，福州有“东西南北四林”的说法，除东林林瀚外，还有西林林泮、南林林廷选、北林林廷玉，均是成化年间进士，同朝为官，又都在正德初年致仕在家，归于梓里，静养门庭。四人年高德重，时常结伴遨游，也成

为当时的佳话。

致仕后的林瀚果如他自己所言，“用罄平生”以“重挹高风于乡国”。他修方志，编家谱，教育子侄后人，闲暇之际又辑录《隋唐两朝志传》以助风化。姚镛认为林瀚敦亲睦族、教化一方的功绩，可以和汉代名臣石奋、唐代名臣阳城、宋代名臣文彦博、富弼相提并论，称其“家政辑睦，子孙醇谨，有万石君之风；处乡里，风动郡国，有阳城晋鄙之化；庞眉皓首，乡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郑公洛社之望”。

闲暇之际，林瀚更多地寄情于故乡的山水。他曾于鼓山赋诗：“登临逸兴追安石，题品雄才耦大年。谁道海滨洙泗地，山川孕秀不生贤？”诗中豪气不减，自比古贤，颇有指点江山的气势。鼓山与林浦隔江相望，旧时有五贤祠，祀有林瀚、曹学佺等5人，很可能是林瀚常游之所。于山也是林瀚留下足迹较多的地方，直到86岁高龄时，林瀚还应督舶太监尚春之邀，登临于山平远台、吸翠亭、狮子岩等处，杖履逍遥，以摩挲老眼，观如画江山。

四

正德十四年（1519），林瀚最后以86岁高龄安详而逝，追赠太子太保，谥文安，赐葬于城北龙腰山，极尽哀荣。20世纪末，因修路需要，林瀚墓经两次迁建，重回故土林浦，葬在九曲山麓。

九曲山又名狮山。按《福州府志》的记载，

当初林瀚的祖父林观为安葬父母，寻人看风水，有方术士告诉林观说：“如果您在狮山下营葬，后辈当有数世贵为公卿。”林观却说：“我只是个种田的人，怎么敢有如此的想法？既然有福，就当与宗族同享。”于是将许多族人的墓也迁到了狮山下。林瀚在逝世500年后，墓地又被迁回此处林氏肇基的福山吉壤，犹如冥冥之中的天意。

九曲山上现存着十多段摩崖石刻。其中一则记载，林瀚有一次率二子庭棉、三子庭楷及庭棉之子林炫拜扫祖莹，傍晚回家的路上看到农民们辛苦劳作。于是，林瀚借机教育子孙不能不知稼穡之艰难。此外，在林瀚遗留的文集中，也能看到大量教育子侄后辈的书信文章。在林瀚的严格教育下，林氏后人不坠家风，“子弟出鲜仆从，衣惟布素，未尝以门第自视”。

当初，林瀚55岁时，四子林庭杓降生，高年添子，喜不自胜。好友李东阳赋诗以贺，诗中有“三凤岂须夸薛氏，八龙今已半荀家”之语。这两句诗本是常见的恭维之语，但用在林瀚身上，却显得很有先见之明。林瀚一生共育有九子，二子林庭棉、九子林庭机，以及林庭机的两个儿子林嫌、林炆也都中进士，位至尚书，即所谓“三代五尚书”，使林浦林氏之家风名扬于天下。

五

林瀚一族门第如此之望，围绕于此也就有了

种种奇异故事。明代著名方志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奇异的故事：林瀚 80 多岁时，梦见太阳落到一个婢女的居所，于是就纳婢女为妾，后来便生下林庭机。按照记载，林庭机出生时，林瀚 73 岁，而且朱氏在生林庭机之前，已与林瀚育有二子，故事的内容并不真实。但朱氏比林瀚年轻了 40 岁，两人间巨大的年龄差距和林庭机一支后来仕途的显赫，还是给了人们不少的想象空间。

这类梦日梦月的说法，对于人们来说，未免有些老套了，于是又有了情节更加生动的版本。据说林瀚家建房时，曾将房梁横于门庭。有一侍女出门时从房梁上横跨而过，匠人认为房梁被女子跨了很秽气，便破口大骂。没想到侍女回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是阁老尚书，不也是从女子胯下生出吗？”林瀚听到后为其胆识感到惊讶，便召见这位侍女欲行媾合之事。侍女正色道：“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老爷您如今年事已高，倘若怀了孕，谁能替我做主呢？何不立下字

据为证？”林瀚命侍女取纸来，未想侍女捧着大红色的机缎而至。林瀚更感这是一奇女子，于是就写下：“举男以机名，女以缎名。”后来侍女诞下男婴，就是日后的林庭机。

清初时，周亮工寓居福州，将这则故事记录在《闽小记》中。在故事的最后，周亮工也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接着又说他和林瀚女婿的后人交好，打听到他们家中真的收藏有故事中的大红色机缎，听起来煞有其事的样子。这个故事重点刻画侍女，林瀚的形象未免有损。不过饶有意思的情节，使得这个故事直至今日，在林浦村中还在流传。

戏说归戏说，如今的林浦村在文化建设上，还是致力于将自明代传承下的培德修学的乡家风加以整理宣扬。在濂江之畔，林浦村建起了沿江绿带，取名“林浦四正文化园”。所谓“四正”，即林瀚所提出的“养正心，崇正德，务正学，亲正人”四事。园中草木清发，随处可以见到林氏先辈诸公的格言家训。

文化园内，有高阁临江，即修葺一新的濂江书院。这里据说曾是朱熹弟子黄榦讲学之所，朱熹也曾一度来此。书院中悬挂着朱熹像，“文明气象”匾额据说也是朱熹所题。书院的一侧是泰山宫，另一侧则是一所现代小学。站在濂江书院，听着隔壁林浦小学中童声琅琅，让人不由想起林瀚曾为家族所撰的“凤鸣天下晓，莺报上林春”一联，仿佛这就是昔日林浦林氏厚重文脉在今天的延续。



濂江书院

寻找濂浦炽

——一个闽商的生前身后事

图 / 文 林文政



林寿熙

—

林寿熙，又名秉璋，字松卿，清同治五年（1866）生于福州濂江边一个古老的村落——林浦，因小名叫“炽炽”，福州人习惯称呼他“濂浦炽”。林寿熙自幼聪明伶俐，在村里的濂江书院读过几年书，认得几个字。濂江书院不大，名气可不小，朱熹和他的女婿都在这里讲过课。林浦的名气就更大了，先是南宋末年收留了一个落难的皇帝，留下了福州唯一一座帝王行宫平山阁

（元朝改名泰山宫），到了明朝又创造了“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科举传奇。林寿熙便是这些进士、尚书的后代，可是家道中落，16岁就坐上一只小船，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去了。

那一年是光绪七年（1881），绍岐码头上人来人往，宋德祐二年（1276），被追杀的宋朝皇室就是在这个码头弃舟登岸的。他们在平山建立行宫，拥立8岁的小皇帝登基。半年后，元兵破城，文武官员带着皇帝继续南逃，后来葬身海上。林浦因为见证了一个王朝的没落而为世人所知。眼前也是乱世，鸦片战争战败，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商帮林立，贸易繁荣，尤其以木材、茶叶为大宗。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内陆地区崇山峻岭，森林茂密。闽江上游出产的木材顺流而下，经洪山桥，运至福州台江的三保、义洲、上下杭一带，形成木材批发市场，然后经马尾港运往外省，市场远及长江流域和北方的大城市。

经人介绍，林寿熙在福州三保的一家木材



谦浦炽大厝大门

行里当了学徒。林寿熙勤劳肯干，又会识字算数，所以深得老板器重，很快从一名伙计当到了账房先生。老板见他待人和气，善于交际，试着让他谈了几桩生意，都不负期望，便大胆提拔他做了掌柜。后来老板在天津又开了分号，派林寿熙前往管理。都说福建人“门内一条虫，出门一条龙”，林寿熙早就想出去闯荡一番了，而且天津距离京城那么近。这一回，他登上的是艘大船……

在天津的几年里，林寿熙对北方的木材市场有了深入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对木

材行业轻车熟路，便产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经验有了，客源也不用愁，只是还缺点资金。林寿熙回了趟老家，找几位兄弟商量了一番，大家纷纷入股，在天津和福州义洲创办了“谦记木材商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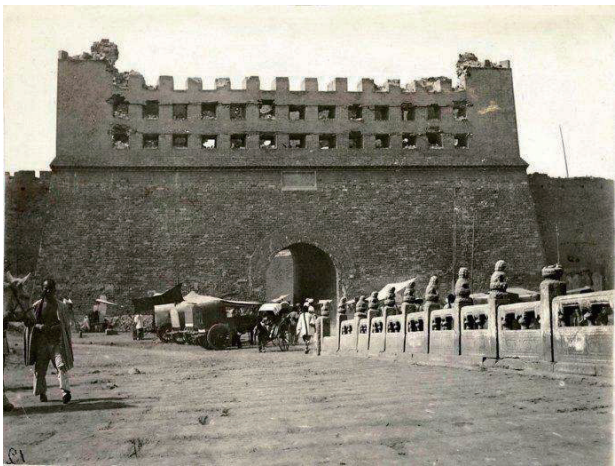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从天津一路打进北京，将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全部付之一炬，大量民居惨遭涂炭，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非常大。林寿熙接到了大量的订单，他深入闽北林区以低廉的价格采购木材，经福州中转，运往天津、北京高价售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不到几年时间就积攒了巨额的财富。林寿熙在经商之余，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经营。在封建社会，很难在商言商，要想做大生意，必须和政府官员搞好关系，需要贵人的提携。林寿熙的贵人就是陈璧。

二

陈璧，字玉苍，生于咸丰二年（1852），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太仆寺少卿兼顺天府尹，



陈璧



1900年被烧毁的正阳门箭楼



修复后的正阳门箭楼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商部侍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户部侍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历任北京市市长、商务部副部长和财政部副部长。林寿熙之所以能结识陈璧，多亏了老乡这层关系。陈璧的老家在今闽侯南通，与林浦所在的南台岛仅一江之隔。

林寿熙与陈璧是如何相识的，我们无从得知。陈璧17岁考上秀才，24岁中举，26岁进士及第，然后四处为官，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896-1899）回闽奔丧，整顿船政，开矿办学。两个人应该是在这段时间里认识的。陈璧回京后，清王朝又进入了多事之秋。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正阳门城楼惨遭焚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的颐和园又遭洗劫。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一回到北京，就将正阳门和颐和园的修复提上了日程。由于慈禧西行期间，陈璧留守京城，安抚民心，与

联军多方周旋，所以深得慈禧太后赏识，被提拔为顺天府尹，并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一起被任命为正阳门和颐和园的勘估大臣。

正阳门俗称大前门，是北京9座城门中最为高大雄伟的一座，是皇城的入口、国家的门面，而颐和园是慈禧太后退居养老的离宫。修复城楼和园林都需要一大笔钱，对于刚刚经历巨额赔款的清政府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颐和园关系到老佛爷的日常起居，一刻也耽搁不得，至于前门楼子，考验文武百官忠心和孝心的时候到了。然而此时大清朝已是江河日下，各省官员多持观望态度。陈璧将这个�息及时透露给了老乡林寿熙，精明的林寿熙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获得颐和园木材的独家采办权，他主动提出捐修正阳门，以报效朝廷。据陈璧估算，修复正阳门需花费白银443000两，不知其中有多少是林寿熙所捐。凭借捐修之举和陈璧的推荐，林寿熙顺利拿下了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项目。

颐和园的水画卷在林寿熙面前缓缓展开。他卖了那么多年的木材，还从未见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建筑。他虽然从小就在宋帝行宫里玩耍，但是从未想过有生之年可以走进真正的皇家园林，参与皇室的工程建设，这是何等的荣耀和风光啊！相比之下，村里的那座泰山宫显得太过简陋了。万寿山上的佛香阁犹如众星捧月，巍峨壮观。还有昆明湖边的那艘清晏舫，园子里唯一带有西洋风格的建筑，华丽的雕刻，拱形的门窗，彩色的玻璃，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或者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将自己的房子也装修成这样多好。

皇家享用的东西，每一根木材都要精挑细选，每一个细节都得全神贯注。林寿熙不辞辛劳地奔波于福建与北京之间，亲自督办木材采购、押运事宜。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白花花的银子也涌进了林寿熙的口袋。林寿熙发了财，便回老家大兴土木。房子呢，就建在宋帝行宫边上，风格上应该中西合璧，紧跟潮流……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阳门城楼修复完毕，林寿熙又为自己捐了个四品直隶候补道员，成了红顶商人，事业和名声都达到了顶峰。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大厝还未落成，林寿熙就遭人检举。按

照文史专家、原福州市文物局局长曾意丹所著的《福州世家》《福州古厝》里的说法：林寿熙采办造园木材时，在押运木材的商船上挂起龙旗，通过关卡时就可以免检免税。林寿熙在办皇差时，挟带了私货，后被人告发，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银铛入狱。审理此案的正好是陈璧。在狱中，陈璧问林寿熙：“你是要钱还是要命？”按照清代的律法，人犯只要死了就算结案，不再追究。林寿熙为避免人财两空，选择了舍命保财，不久就吞金自杀了，既保住了家产和名誉，也保护了可能受牵连的人。

三

奇怪的是，作为清末巨商，林寿熙身后居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不管在正史还是野史里



北京颐和园清晏舫



濂浦炽大厝正厅



正厅后的洋楼



大厝二楼披榭



螺旋式楼梯

都难觅其踪，即使在乡间，也只有支离破碎的口头传闻。所以我决定到林浦走一趟，看看能否从他的后人那里获取一些可靠的信息。

濂浦炽大厝位于仓山城门镇濂江村泰山前3号，距泰山宫不到百米，背靠平山，坐东朝西，占地约5000平方米，建成后一直是村里最豪华的住宅。建筑前有“福”字照壁，高大的门楼犹如一堵城墙，13级台阶气势恢宏，显示出主人显赫的地位，在一片新旧混杂的民房中显得尤为醒目。紧闭的黑色大门使大厝更显得壁垒森严，和

他的主人一样高深莫测。正当我端详着精美的砖雕和灰塑，负责管理大厝的林大湘刚好回来。林大湘今年76岁，他的爷爷林梅卿跟林寿熙是亲兄弟。他热情地带着我参观了整座宅院，一边感慨着岁月的侵蚀和维护的艰难。

大厝共有三列，中轴为传统风火墙式建筑，古朴典雅，前为天井，左右披榭二层。正厅名“孚荫堂”，为纪念林寿熙先父林恒孚而设，厅前横梁正中供奉圣旨龕，彰显着主人昔日的荣光。正厅背后和左右两侧各有一座两层西式洋楼，右

侧洋楼的一楼有舞厅，内有西式壁炉，廊下有罗马柱，左侧洋楼中有螺旋式楼梯，这在当时十分罕见。林大湘说，这座老房子不仅做工精致，而且选材优良。由于林寿熙是木材商，所以建造自家的豪宅自然选用的是上等优质的木材，梁柱多为柚木和杉木，木料胸径达60厘米，有的超过12米长，均有百年以上的树龄，门窗则采用木质硬度适中、不易变形、易于加工的楠木。

坐在大厝的天井中，林大湘聊起了家族的往事。对于林寿熙的发迹以及在北方的光辉岁月，他并没有更多的了解。他告诉我，林寿熙是个很重亲情的人，在他发达后，不但建了这座“上新厝”给自己和几个亲兄弟住，还在见泉林公家庙对面，给堂兄弟也盖了座“下新厝”。此外，林寿熙在仓山还有一座红砖洋房，在原来福州茶厂的位置，据说更加豪华，1949年以后成了茶厂工人的宿舍，后来被拆除了。宣统元年（1909）四月初八，林寿熙突然去世，年仅44岁，埋葬于林浦附近的湖地里村。林寿熙生有两儿一女，长子林琪藩接管了“谦记木材商行”，抗战期间天津大沽口沦陷，一艘满载“谦记”木材的俄国商船被日军充为军需，损失惨重，商行从此走向没落。林寿熙的后人中，读书的多，经商的少，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旅居海外。1949年以后，大厝曾被村大队部、黄山中学使用，日渐败落，正厅后的洋楼二楼一度倒塌。大厝的后山原有私家花园，后来荒废了，兴建了林浦小学。2004年和2008年，后人共同出资100多万元，对大厝进行

了两次修缮，修复了正厅和背后的洋楼。

四

现在林寿熙的孙子辈，只有3人依然健在。关于林寿熙的死，他的后人，包括他年过八旬的孙子林瑞鼎，都认为“吞金自杀”的说法没有史实依据，纯属无稽之谈。由于过去的商人都是将老婆孩子放在家里，一个人外出打拼，所以在外面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无从知晓。林寿熙在京城赚了大钱，才40多岁就客死他乡，难免引人猜测。他的后人提出了几点质疑：

首先，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璧升任邮传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交通部部长，怎么可能到刑部审理林寿熙的案子？而且当时陈璧因为严禁腐败，废除官吏乘火车、运货免价的特权，触犯了一些贵族官僚的利益，于宣统元年（1909）遭到了弹劾罢官。其次，犯人入狱时只能身穿囚服，所携带的物品必须没收干净，林寿熙吞的金又从何而来？再者，林浦村口至今还立着一块墓道碑，上书“清诰授资政大夫直隶候补道秉璋松卿林公神道”，碑顶刻有“圣旨”二字，如果林寿熙是畏罪自杀，他的遗体怎么可能千里迢迢地从京城运回福州，朝廷还御赐了墓道碑呢？

所以，林寿熙的后人坚持认为林寿熙是病逝的，至于是什么病就不得而知了。旧时医疗条件落后，伤寒、中暑都会引起死亡，同时也不排除中风、脑梗死、心肌梗塞的可能。林寿熙的曾



绍岐石塔与魁浦大桥



林浦村口的林寿熙墓道碑

一位老人主动给我当起了向导，陪我去寻访那些存在和消失的古迹。

沿着江边的公园边走边聊，我们不知不觉

孙林曦小时候生活在林浦老宅。据他回忆，他105岁去世的祖母曾对他说起过：林寿熙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做生意，盖大厝时专程返乡上梁、办酒，然后马上赶回天津。当时正是春末夏初，天气开始变热，林寿熙来回奔波，过度劳累，到了河北就病倒了，死在了半路上。好端端的一个人，出门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副棺木运回来，使人浮想联翩，坊间的传闻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无头公案。而大厝的规模，也因为林寿熙的突然病故，比原先计划的缩小了许多。

走出濂浦炽大厝，我决定到江边走走。十年前我曾来过几次林浦，都是带着朋友来参观泰山宫、濂江书院和林尚书家庙。而今村子里除了多了几座水泥房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村子周边的环境，已经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濂江对岸的湿地上，海峡会展中心、福州规划馆、中庚酒店拔地而起，泰山宫前的沿江地带修建了公园。我努力寻找着那个消失在记忆深处的水乡，

走出了林浦村，来到了新修的南江滨东大道上。卡车疾驰而过，令我一时恍惚。从泰山宫一路走来，我发现，不过十年的光阴，绍岐码头已无迹可寻，原本伫立岸边的石塔和荒草淹没的炮台也跑到了人行道上。站在2012年通车的魁浦大桥下，我已经想象不出这里十年前的样子，更何况一个世纪以前，那个林寿熙生活的时代。

老人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着这座村庄的故事。故事怎么也讲不完，他坚持要陪我走到公交车站。当公交车开动，我望着老人不断缩小的身影，不禁百感交集。再过十年，这座古村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有朝一日这些老人都不在了，又有谁能将这些故事继续传说下去？临别时，老人对我说，无论如何，濂浦炽为重修正阳门、颐和园出钱出力，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是个有责任感的商人，他是我们林浦的骄傲，所以你要好好地写他。虽然他已经走得太久、走得太远了，背影是那么的苍老，那么的模糊……

永远的维廉同志

景 艳

他依旧穿着那套他常穿的蓝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蓝底白点的领带，端坐在那张熟悉的办公桌前。戴着眼镜，握着笔，面对着他那本书写得密密麻麻的小笔记本。黑色的牡丹牌老式收音机、机械发条闹钟、黄色的拨号电话以及那标配的青花茶杯都是他用过好多年的老物件。以前，找他的人多，他总是这么抬起头，温和而又沉静地倾听着。而今，他还是这般神情，只是闹钟不再嘀嗒，电话不再响起，收音机不再歌唱。灯影之下，他的蜡像，在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三楼一侧的人物展厅里，和周遭的物事定格在某时某刻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人往风不微，他，是永远的维廉同志。

“我就叫曹维廉”

“一唱歌声震浦江，曲里烽烟，队伍激昂，长空捷报送前方，转战艰辛，浩气高扬；沐雨梳风为富强，北去南来，历尽寒暑，思君月夜共明光，千尺桃潭，契谊芬芳”。这是江泽民同志1998年寄悼一剪梅所作的《忆维廉同志》，以非



曹维廉

常浓缩的笔墨概括了曹维廉同志不平常的一生。

曹维廉，1916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基督教家庭，福建长乐人。1933年，毕业于福州市鹤龄英华中学，经人介绍到上海大华无线电厂当学徒。三年之后，年仅20岁的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在几十名大学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单独考入了欧亚航空公司。然而，当抗日的烽火燃烧于华夏大地的1938年，他却毅然舍弃了这份得之不易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参加了浙江金华抗日游击队，在进步音乐家麦新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的一段全新的革命生涯。同年秋，调任新四军军部通讯大队任机务主任、电讯班主任。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三个弟妹曹维新、曹维礼、曹维真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他用纯熟的英语回答说：

“只有赶走日本鬼子，国家得到解放，千千万万像我弟妹年纪的同胞才有书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曹维廉的思想突破了家庭与宗教的局限，有了更广阔的翱翔天空。

相信很多了解曹维廉生平的人都会和我一样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他怎么会叫这样一个洋气的名字？在那个年代，显得多不合时宜呀。曹维廉先生的长子曹耘告诉我，这与爷爷曹士钦信仰基督教有关。父亲从小在唱诗班里长大，又在教会学校读书，起一个洋名字很正常。

然而，即便如此，参加革命之后，改个名字不也是很正常的事吗？在那样一个处处飘红的年代，有多少人借助改名来彰显自己的决心和忠诚？中国著名的记者、翻译家、作家萧乾先生在《哭亡友曹维廉》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他就这个问题与曹维廉先生的探讨。他不讳言地说，像这样一个“带点买办资产阶级味道”的名字，换作自己肯定早就换了，“换个响当当的。”没有想到，曹先生的回答是：“不，我永远也不改。一个人有尾巴，藏起来做什么？越是有个洋尾巴，越是要它留在那里，这样才不会忘记它。这个尾巴会提醒我，鞭策我。改掉，就会忘记了。”萧乾说，这是他“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唯物主义”。

这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唯物主义”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意志和理想作支撑的。“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不肯昧着良心做事。”曹维廉夫人周馥秋女士回忆说。“文革”初期，电工局的“造反派头头”请曹维廉出任“三结合”领

导干部，没想到被他一口拒绝：“我与你们看法不同，不能与你们结合。”之后曹维廉就受到了多方发难。陪斗挨整的时候，因不肯下跪喊口号，被“造反派”踹成了重伤，无法站立，但他仍不丧失原则，义正词严地反驳各种不实之辞，即使有问题也绝不上推下卸，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曾任国务院核办公室副主任的汤紫德对他十分敬重。当时，一个当权处长指着曹先生的额头说：“你可以自杀了，不用再活下去了。”曹先生则说：“我绝不会自杀，我不相信世界就是这样，我要看今后究竟会发展成怎么样。”周馥秋女士说，正是因为他有这样坚强的信念，才能抵挡外来任何形式的威逼和利诱。

“请叫我维廉同志”

纪念馆诺大的展厅中，曹先生的身影显得清瘦而孑然。而现实中，亲和幽默热情的曹维廉总是和同志们在一起，从来不曾孤单。他会好几种方言，喜欢唱歌，南腔北调的家乡话和快乐昂扬的歌声非常具有感召力，他的周围总会聚拢来好多人，释放出温暖和明亮，很多人眼中复杂的关系，在他这里往往变得简单而纯粹。

曹耘向我透露了一件事：当年，东北工业部和华东工业部要合并成机械工业部，周建南和曹维廉当时分别是东北、华北工业部的电工处处长，可是，一合并，正职就只有一个，谁当呢？曹先生主动对周建南说：你是延安来的，资历

老，又是大学毕业，就你当正，我当副吧。就这样，一件原本非常容易引起矛盾的事轻轻松松就解决了。之后，两人的合作还特别好。“周叔叔常常晚上到我家来和父亲一起商量工作，商量完要回家了，父亲就送他。在汽车局大院，两家是一南一北。往往是把一个送到家门口，另一个又要送回来，来来回回好几趟。最后，两人定下来在中间分手。”曹耘说，“那时候，他们都是用一种非常虔诚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彼此间是那样真诚的同志关系。”

曹维廉经常跟夫人周馥秋说：“我是辞去欧亚航空公司的高薪职位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是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不是为了革命胜利后有更好的待遇及享受。”基于这一信念，他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哪怕是制度允许的他也放弃。看病、访友、上班都是挤公共汽车，和群众打成一片。下工厂都是径直走到车间里和工人们交谈，然后才听取厂领导汇报。对工作、生活



琴江满族村曹维廉、曹鸿翥故居“友于草堂”

中接触到的所有干部群众都非常关心、爱护，从不因为对方职务高低而差别对待。在他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期间，有东北的工人到访，他不仅热情接待，还一直送到离家较远的车站，深夜才回家。夫人抱怨他太热情，他郑重地告诫说：“他们在工厂能找一位领导谈谈心里话都不容易，今天有机会到北京出差，到一位副部长家里谈谈心里话，对他们来说，一辈子没有几次机会，我当然应该对他们千百万倍热情才行。”

作为儿子，曹耘和周霁听到最多的就是父亲教诲他们做人的道理：“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做任何事都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帮助别人时别想人家有任何回报，施比受更快乐。”因为长期在重要岗位上工作，曹维廉认识不少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但他却很少联系。比如曹维廉有一位“张大哥”，两人患难与共、私交甚笃，但在他位高权重的时候，曹维廉从不主动靠前，更不请托。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顶住了造反派要求互相揭发的压力，还专程前往看望。而“四人帮”倒台，“张大哥”恢复工作，曹维廉就再也没去拜访过。看了周馥秋女士在《回忆曹维廉同志》中的叙述，我猜想这位“张大哥”就是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上将，曹耘答复：“是。”而此时，距离张爱萍将军逝世已近15年了。在周馥秋女士的记忆中，每逢春节，除了父母，她总是陪着曹维廉去看望那些困难的同志。其中，两位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害自杀了的干部的家属是每年初二必访的。

曹维廉在北京当了20多年的局长，他升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之后，人们仍然长期地、习惯地称他“曹局长”。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之后，人人称他“曹社长”，秘书许祖根也想跟着叫，没想到，曹维廉说：“你还是叫我维廉同志吧。”“就这样，一直到他离开我们为止，我一直称他为‘维廉同志’。”

岂因儒冠误此生

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乏命运多舛者。杜老夫子有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李白有怨“白首为儒身被轻”，元好问更直言“一钱不值是儒冠”。曹维廉却认为：“男儿应是重危行，岂因儒冠误此生。”他常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依靠科技，一定要依靠知识分子。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科研基地的建设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西安高压大容量研究基地，是当时远东地区试验装备参数排第一的研究所，它的建成结束了中国高压电器新产品必须到国外做试验的历史，对我国高压输变电设备的转型升级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而这个基地，正是曹维廉先生克服了经费短缺、苏联撤走专家等重重难题，以“当掉裤衩也要保西高所的建设”的决心，“设备烧掉重新再建”的恒心，倚靠我们国家自己的力量主导完成的。

曹维廉先生尊重、爱护科技人员，对各类研究所关怀备至，但并不意味着他会迁就姑息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别看他平时和大家说说笑笑，没有一点架子，其实，谁要是在工作中出了不该出的差错，他一点情面也不留。有一次，他到工厂检查工作，走在精密电表装配车间的楼梯上，发现挂着一口痰，非常生气：不清洁文明的生产，怎么能保证精密产品的质量呢？随即从裤兜掏出了一条雪白的手绢，俯身把那口痰擦掉了。虽然没有出言批评，但他的行动已经让身后的厂领导汗颜不已，连声道歉。

1958年，他出差到哈尔滨电机厂，厂领导汇报夜班工人的出勤率有95%，他什么也没说。结果到了半夜1点，他悄悄叫醒秘书，叫了辆车直奔车间，自己一一清点了才回来睡觉。

曹维廉在工作中呕心沥血，雷厉风行，是机械工业部有名的“拼命三郎”。他认为：“搞好产品质量，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产品标准来规范生产。”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建立电器产品的“八一标准”，之后，又参照苏联修订了我国电器产品的国家标准。他认为应当把采用国际标准作为振兴机械工业的一项战略决策来对待，在1978年一机部全国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机电产品首先采用国际标准的建议。

1981年2月底，上海跃进电机厂出口西德的电机发生了质量事故，产品达不到国际通行的标准。曹维廉非常重视，通过现场的检查分析，和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提高电机质量的69项措施。

厂领导保证说两个月内实现大部分措施，维廉同志就说：“记住今天的日子，两个月后我一定来检查。”大家都以为说说算了，没想到，4月底，他果然专程而来，待了3天，看着69项解决了63项，还有几个有难度的，相约两个月后再来检查。这一次，工厂领导不敢等闲视之，没到6月底就发电报，欢迎他再来检查，维廉同志真的又来了。那一次，西德专家验收了一万台电动机，台台合格，还写了书面鉴定——跃进电机厂的产品质量是“可以信赖的”。事后，《人民日报》专门刊发了题为“部长三下跃进厂”的报道。

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封闭，中国的机电工业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产生了很大差距。曹维廉花了半年多时间，率团走访了欧洲11个国家295个工厂，对国外新技术、新产品的现状与发展，作了深入的了解和报告，重新搭建起了与国际电工委员会的交流渠道。他调查撰写的《电器工业发展战略规划》，实际上成为我国电器工业的发展纲要。

永远的维廉同志

1982年，曹维廉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那一年，正是中方正式向外界宣布决定解决香港问题、中英谈判启动的一年。为了避免香港回归带来大面积震荡，将社会耗损降到最低程度，中央政府特别需要能够和香港各界建立起有效沟通渠道，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既能

忠实执行中央政府决策，又能够最广泛地团结香港同胞，充分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曹维廉同志在这个时候被派驻到香港，何尝不具沙场点兵的意味？那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要将“一国两制”率先适用于香港，而这条世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要怎样让香港同胞们信任并接受呢？曹维廉殚精竭虑。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回忆说：“各行各业的人，上至大老板，下至普通记者都喜欢找他促膝深谈，交流思想。这类既平常又频繁的社会活动，对于工作已近乎超负荷的维廉同志来讲，确实是勉为其难。但他还是以工作为重，有求必应。交谈中，每当涉及内地或香港有关投资、证券、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以及热门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话题，维廉同志总是细心和耐心地倾听，然后从形势和政策的高度，进行分析、解答，摆明事实，讲清道理，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既不生搬硬套地说教，也不强加于人，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以理服人，大家都视他为知心的朋友。”

有一次，一位香港朋友向维廉先生诉苦，说在和内地进行贸易往来时遭受到委屈，维廉同志语重心长：“所以说，爱国是不容易的，尤其爱我们这个经历过如此艰辛历程的祖国，更不容易。但是，爱国绝不要动摇，要坚定地走下去，最后人们会理解的。”他还对这位朋友说，“你是和内地做生意的，你一定要赚钱。中国就是要在对外开放中学习本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发展经济。

你们来投资，来做生意，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国家取得进步。”回想到这一幕，原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陈可焜说：“他的肺腑之言，何止在场的爱国港商眼中闪烁着泪花？我们在场的人，同样深受感动。”

当时的香港相较于内地，颇有点花花世界的感觉，但曹维廉来了，照样保持着原来的俭朴生活，还要求夫人和他一样。新华社有个医务室，但曹维廉让夫人少去，因为“那里只从广州调来一个大夫，要照顾全社很多人，而且很多药品是用外汇买的”。夫人周馥秋有时被说烦了，忍不住怼他：“有些人地位比你高，入党比你早，还不照样在挥霍享受？”曹先生坚定地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坚持我的信念到最后一分钟。”

冥冥之中，一语成谶。1984年9月28日，也就是中英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公布后的第三天，曹维廉同志在香港突发心脏病病逝。就在两天前，他刚刚出席了福州十邑旅港同乡庆祝国庆35周年的宴会，前一天，还在听取有关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的准备工作的汇报，可以说是为国家，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一天，夫人周馥秋恰好回京看望两个儿子，不在身边。说到这，她泪如雨下：“这是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他却在漫天的礼花中渐行渐隐；那一个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他只能化作星月魂牵梦萦。陈可焜先生说：“倘若天假

以年，让他再活五年十年，他定能为国家的建设和香港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哪怕再多活一个月，人们是多么需要他啊。”张爱萍上将在其骨灰安放仪式上说：“曹维廉同志品格高尚，在这方面甚至比某些地位比他高的同志要好得多。”王光英副委员长说：“从维廉同志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位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优秀共产党员，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福州长乐，琴江满族村的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兵房，是维廉同志的故居——一座美丽的中西合璧、园林式的庭园。在现年99岁高龄的贾素芬老人的记忆中，维廉同志到北京工作之后，就回来过一回：“这里亲戚熟人很多，可他是国家的人。”2017年的10月，周馥秋和长子曹耘来到这里，坐着车在故园外转了一圈，没有进去就离开了，她说：“一切，都交给国家。那也是维廉同志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西楼大鹅门东边的楼厅，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了一个场景：一群青春洋溢的青年在这里弹唱欢歌，那是维廉同志生前非常喜欢的《青年颂》：“我们是五月太阳的儿女，我们是突破黑暗的先锋……在昆仑山的最高山的最高峰，在帕米尔的高原上，打着火把指点着东南，那是我们梦中的祖国……我们举起拳头宣誓，凭着头上的蔚蓝天，为你生，就决心为你死，死在你的怀中我也甘愿……”我轻轻触了下那蜡像的手，竟有些暖意。

维廉同志走了，可是，他，没有死。

潘汉年“出使”闽都

薛宗耀

肩负使命赴闽都

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代表中共苏区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在瑞金草签《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是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严峻时刻，曾经兵戎相见的两方签订的第一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内容的协定，标志着“苏方”与“闽方”建立起初步的合作关系。

依据《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命潘汉年为全权代表，立即前往福州，落实《初步协定》的各项约定，促进或协助以十九路军为主的“抗日反蒋”力量早日揭竿而起。潘汉年回忆：“当我离开苏区时，同志们提醒我：‘留神，小心点，可别让他把你给宰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同我告别时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但潘汉年对此行“满怀信心”。

潘汉年与福建省政府代表徐名鸿一行人告别瑞金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



潘汉年

发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到场送行。一行人抵达长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设宴热情款待。他们由连城县新泉进入十九路军控制的地域，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派时任第四十九师参谋处长周力行（即周士第）带队前来迎接和保护。

依据《初步协定》第七条关于“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的约定，他经新泉、古田、龙岩，化装成十九路军军官，由厦门搭海轮抵达福州，也住在驻闽“绥靖”公署内。

此时正处在“福建事变”爆发前夕，黄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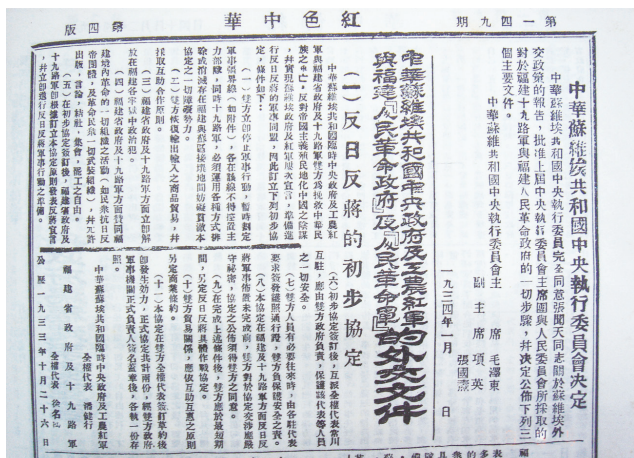
翔、叶挺、欧阳予倩等百余名海内外“抗日反蒋”人士陆续来到福州。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气氛异乎寻常。据潘汉年秘书黄火青回忆，他与潘汉年经常“穿着国民党军装，扎上武装带到街上跑一跑，看看报纸，了解社会动态”。

潘汉年还同蔡廷锴和时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以及他们俩的老上司，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的主要人物频繁接触，曾列席他们召集的军事会议，促使他们加快举事的步伐。

1933年11月20日上午，“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较场召开，标志着“福建事变”爆发。当晚，“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原驻闽“绥靖”公署开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人民革命政府”），推举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的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老长官）为主席，首都设在福州，办公地点在省府路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大院。由此，在中国，它与首都设在南京的中华民国、首都设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三足鼎立”态势。潘汉年实际上担任了苏维埃中央政府派驻“人民革命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

履行使命在闽都

自草签《初步协定》至“福建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已经召集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围剿”。因中共临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者压制党内的正确意见而听从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致使红军不仅失守闽赣省苏区首府黎川，而且在中央苏区北线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几场战斗中屡屡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局不利。在这种形势之下，潘汉年深知自己在统一战线上所负有的使命极其重要且紧迫，所以甫抵福州，除了加紧促进“福建事变”爆发外，又马不停蹄地开展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促使“闽方”与“苏方”谈判，划出双方军事疆界线。

1933年7月至9月，彭德怀奉命率领中央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十九路军损失四五个团，蒋光鼐、蔡廷锴连忙委托曾是早期中共党员的陈公培前往闽北前线的延平县王台谈判求和。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不仅弭兵休战，而且大致划出闽北地区双方军事疆界线。

潘汉年入闽后，促使十九路军再派闽西善后处办公厅秘书主任陈小航为“闽方”代表前往中

央苏区的长汀，与“苏方”代表、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第一局局长张云逸谈判，于1933年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双方划分了在闽西地区的军事疆界线，并对开通交通干线、设立检查站、恢复邮政往来等做出规定。

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闽”双方基本划清了边界；也意味着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出现了大缺口，“苏方”有了一个较安全的东翼；同时，“闽方”在与南京政府对抗时后顾之忧无忧。

二、促使双方立即开展互惠互利的商贸活动。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和“交通封锁”，致使中央苏区在经济建设、军事装备、生活物资等方面都遇到较大的困难。“苏方”除了自力更生外，抓住“福建事变”爆发和有关协定、条约签订的契机，致力于与“闽方”开展商贸活动。



驻闽“绥靖”公署大门口

由此，潘汉年与时任“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质交换的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据许锡清回忆：“苏方”希望“闽方”供给的物质，主要是盐和西药。据潘汉年回忆：“我们提出在我们地区与他们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问题。我们缺少很多生活必需品：食盐、药品等等。但我们苏区有些产品卖不出去，如纸张、大量的钨。他们赞成开展贸易。这样就达成了协议。”

双方的商贸活动，对于强化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支援红军的军事斗争、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等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潘汉年曾评价：“苏区的情绪大大高涨起来。大家都认为同十九路军建立贸易联系是正确的。十九路军地区的居民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可以向苏区出售自己的商品。”

三、促使“闽方”立即全面履约释放政治犯。

11月22日下午，“人民革命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议就决定：“12月1日赦免一切政治犯。”25日，第三次中央委员会议议决修正通过《大赦令》：“在中华共和国未成立以前，其有反对卖国贼蒋中正及其御用的国民党，并其御用的所谓中央及地方政府，因革命行动，或仅有反对言论，而遭其逮捕监禁处罚者，固毫无犯罪之可言。……应一律予以赦免。”30日，李济深签发第七号主席令，颁布《大赦令》。

12月4日开始，“人民革命政府”所属的高等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各军法处分批释放了监狱

中被判无期徒刑或5年至15年不等有期徒刑的所有政治犯，使马立峰、范志明（即范式人）、杨赫光（即杨采衡）、蔡明善（即蔡园）等一批坚贞不屈的革命同志免遭杀害且重返战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增添了宝贵的力量。

四、促使“闽方”有条件地允许民众开展有利于革命的活动。

当时，中共地下党员梅龚彬、季雨时、陈昭礼、靖任秋、龚饮冰等，都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苏区秘密来到福州的“苏方”人员，也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如赖祖烈在龙岩贸易谈判成功后来到了福州，投宿台江汛“法大旅社”，他回忆：“每次都是潘汉年来找我……经常乘小船到闽江上谈工作。潘汉年把他写给中央的报告交给我，由我用密写的方法把它抄在账本的背面，账本的正面随便记一些账目，以防止人家检查。”

潘汉年还通过“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彭泽湘、兴泉省代省长陈公培等党外要员了解其内部情况，然后起草电文，由黄火青译成密码，及时报告中央。后来，潘汉年根据回电精神，让黄火青返回瑞金作全面的汇报。1933年底，苏维埃中央政府改派黄火青前往漳州，担任驻“人民革命政府”龙汀省领事。

中止使命离闽都

依据《初步协定》，潘汉年与“闽方”领导

人多次谈判，力求双方形成军事合作，以便共同对抗蒋介石军队，亦可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创造有利条件。遗憾的是，受内外因素的制约，谈判未果。

据时任“人民革命政府”秘书处秘书麦朝枢回忆，潘汉年在福州“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与陈铭枢进行谈判共有八次”，“谁领导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合作的具体条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潘汉年也回忆到，签订具体作战协定的谈判“进展不顺”，致使双方的军事合作迟迟得不到落实。

在内因方面，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秉承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很快又否定正确的策略而采取相反的方针。这样，潘汉年在福州工作取得若干初步成果后，就被束缚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

此时又发生一起泄密事件，即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擅自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名义接受记者采访，透露了同十九路军方面秘密谈判并签订《初步协定》的情况。《中国论坛》据此刊登《共产党谈对福建的看法》的报道，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闽方”领导人误以为是中共高层违反了《初步协定》第八条关于“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的约定，致使互信产生了问题，也影响到签订作战协定的工作停滞不前。

1933年12月下旬，蒋介石调派“讨逆军”入闽。“闽方”研究抵抗方略莫衷一是，曾经请

教潘汉年。潘汉年建议：“现在唯有即刻实行打土豪分田地之一法，这样才能把坏人搞去，振起人心，鼓起士气，对付蒋介石；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毛泽东、朱德也致电“人民革命政府”及十九路军：“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你们立刻依照我们反日反蒋的协定所决定的基本原则，采取断然的行动，集中你们所有的武装力量，立刻开始反蒋的决战。同时必须最坚决的发动与武装广大的民众，组织真正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真正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民主权利来开展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我们相信只有依靠于千百万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但“闽方”由于派别繁杂、思想混乱，又有内奸从中破坏，始终没有采纳毛泽东、朱德和潘汉年的建议。

“闽方”面临严峻的局势，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仅否定毛泽东等人提出的直接出兵



于山补山精舍

援助十九路军，或在闽赣边界打击国民党“讨逆军”的正确主张，反而要将中央红军主力调到中央苏区西北面作战。

潘汉年回忆，当“讨逆军”入闽时，“蔡廷锴和叶夫根尼·陈（即陈友仁）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如果红军不去援助他们，他们将不得不撤退”。“闽方”一面直接致电朱德，一面请潘汉年电告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红军稍向东移，靠近闽北与十九路军相联结的要求。几天后，潘汉年回话：最好是十九路军赶快派代表去瑞金直接协商。在潘汉年的安排下，“闽方”派“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参谋处长尹时中于1934年初随奉命返回中央苏区的赖祖烈等人前往瑞金。

1934年初，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入闽与蒋军作战，但为时已晚，“讨逆军”接连攻下南平县城、古田县水口和县城。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

1月12日晚，十九路军开始向闽南总退却。张云逸先是随军到泉州，嗣后化装离开队伍，在厦门乘外轮抵达香港，返回瑞金。13日，“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办公，各级官员纷纷撤离福州。潘汉年在梅龚彬的帮助下，于14日乘外轮离开马尾港，经厦门、汕头于17日抵达香港，而后通过地下交通，经粤东、闽西返回瑞金。

流水中的花洲玉岛

治莹

天生一个花洲玉岛

亿万斯年，天地洪荒，风霜万里，闽江不知在何处？白驹过隙、斗转星移，天地间诞生出纵横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八闽，闽之中又涌流出浩浩荡荡一江水。那个时候，江中并无江心岛。或久旱、或洪流，从远方山岭流泉中汇聚、又一路东流的闽江水或许带来一堆堆乱石，涌聚到福之

州。一路奔波，从棱石滚成卵石，不想再远行他方了，就歇脚在后来被称为榕城仓山的一方水域。又历经百年千载，再从远方群山深处随着流水裹挟而下的泥沙，流到乱石堆积处，被挡了阻了，也就不再辛劳，和大小石块们相拥相凝，从此不分离。光阴荏苒，四季层叠，或是山洪、或是狂风，又一回回、一次次地把顽石、柔沙聚集于此。天长地久之后，仓山福地的此方水域就有了一个冲积沙洲，拱露出一个小小岛。岛积岁月



之流沙碎石而有容乃大，从一尺一丈到十亩八亩，直至后来的数十亩，此岛也就从小到大。水中之地，江心之岛，乃天赠地赐，又身处万寿桥边，宝中之宝矣，于是，世人为之心仪。相传明成化二十年（1485）之春，当时的闽县、侯官、怀安三县耕种者竞相登洲插杆围地，矛盾横生之下，锄来铲往，引起械斗。由于三县县官均不能解决纷争，后由福州府判决此岛三县共有，故名“三县洲”。从此，三县洲风风雨雨数百年。

多县相争之三县洲，让原本无声无息的一方小洲，从此声名大振。又因为洲上野花盛开、树木葱笼，实在是一处水中胜地，因此引发各朝各代文人墨客们过渡登洲，一睹洲外的八方风光。特别是宋代，不少知名诗人词人到福州为官，或者也曾乘舟过渡一睹三县洲芳容？有待寻踪觅迹而考证矣。

久而久之，又说三县洲不仅风景这边独好，而且风水甚佳，被广为关注。有人捷足先登，特别是以捕捞为业的渔民，以舟船或排筏过渡上岛，或以石块垒高建屋入住、或用木柱撑起木房立足。更有闽北各地从水路贩运木材的伐木人，绕山过峡一路撑筏进入福州，大多选择三县洲作为停靠之地。定居的、路过的、买卖的，既有文人雅士又有市井百姓，三县洲也就五光十色了。特别是夜间，灯红酒绿、肉香酒甜，人头攒动之中，叫卖声、歌谣声、开怀说笑声，此起彼伏，声声入耳。时至20世纪50年代初，单单是洲上的居民，就发展至460多户、2600余人。这数百

户人家，大多是驾舟沿江捕鱼的渔民，也有长期在洲上经营小本生意的买卖人。1953年因闽江两岸修筑防洪堤，水流集中冲刷三县洲，洲地四周被水流削切，面积逐渐缩小，危及洲边近水的吊脚楼等建筑物。为确保洲上居民安全，福州市政府拨出专款，将居民全部迁出，洲地辟为仓山区农场。

尽管三县洲的花花草草一岁一枯荣地自生自灭、风吹草地见荒芜，却仍是一方金贵之地，也年年岁岁地吸引国内外人士登洲观赏。继1900年美国汤姆·逊拍下树影婆娑的三县洲后，又有日本等国摄影人拍下“江上的岛、城市的回忆”之存照，向世人展示着三县洲沧海桑田之岁月。

情之岛爱之洲

开垦为农场的三县洲，虽有一些农作物收成，但春夏绿了，秋冬又荒了，因无特别的景致，也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仓山区政府组织开发三县洲，前后历时六个春秋，在1982年一个金色的日子里，鸟语花香别具风味和情趣的天然水上公园，欣欣然横江出世。犹似宽阔闽江水上的一张笑脸，笑对福州内外的游人。岛上的亭廊楼阁、小品雕塑等园林设施朝夕沐浴着山光水色，尤其儿童游乐场所，带来无限的童趣。五颜六色的植被，让初生的江心公园花团锦簇。时至20世纪90年代，知名度日高的江心公园渐入鼎盛，夏日游人常常过



万。那时的当红歌手郑绪岚，演唱了《太阳岛上》，曾使哈尔滨的太阳岛风靡于大江南北，游人如织。而榕城市民因为拥有水上江心公园这个“小太阳岛”，也就不必舟车劳顿远赴东北了。特别是上渡一带的居民，常常划舟乘船上洲。每至夏日，下闽江游泳戏水者，也借三县洲作为小憩之地。

因为三县洲与闹市仅一水之隔，有隐秘之功，自然成了情爱男女的心仪之地。特别是在那情感深藏的年代，三县洲就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爱情港湾。作为文化教育集聚地的仓山区，以福建师大为引领的多所校园，莘莘学子中有多少风流倜傥的玉面郎君，又有多少豆蔻梢头、娉娉袅袅的大家闺秀，成双成对地选择避开尘世闹市的三县洲卿卿我我，虽不苛求日后琴瑟和鸣，却丢不下一时的蜜意浓情。因此，三县洲不知哪年哪

月，似乎成了年轻学子们魂牵梦萦的爱之地。有一对情侣在校园内不许恋爱的禁令之下，便把情意寄托于三县洲，隔三岔五邀约到洲上互诉衷肠，毕业后，果然喜结连理而举案齐眉。不仅仅是校园学子中五彩斑斓的情爱，许多青年男女，也同样把三县洲当成一个爱之巢。当年有一对少男少女，因为两家是邻居，从小青梅竹马，青春年少时，已情窦初开，但又不敢在父母家人面前表露，于是，常常以暗号相约闽江边的龙潭角。一日，双双过渡到三县洲，第一回手牵手、心贴心。若干年后，这对小情侣被上山下乡浪潮席卷到闽北一处山乡，还常常在田间地头念想着让他们爱情之花绽放的三县洲……如此这般让三县洲见证爱情的情侣，古往今来又知多少？

在今日的阳光之下，去看看岛之东头亲水的一株古榕树下，密密匝匝的连心锁，在江水粼

粼波光的映衬之下，影影绰绰、低吟耳语地告诉人们美好的爱情故事。爱之岛、情之岛，情爱深深，每一片树叶，每一朵小花，都放蕾舒怀地告诉人们该如何的天长地久、大爱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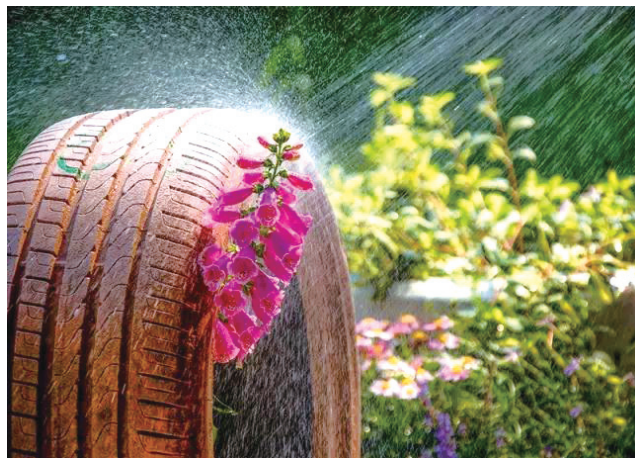
水上的花红柳绿

20世纪90年代初，仓山区决定在龙潭角修建上岛大桥。前后两年，一座悬索桥横闽江而架，直通江心公园。从此，江水变通途，悬索桥上怡然飘逸、步履翩翩。进出的便捷，让公园的客流量陡增，也因此常有靓丽之日。最是1995年的元宵节，中央电视台的元宵晚会，把江心公园作为分会场，如此殊荣，一时间让园里园外色彩缤纷、亮光闪闪。

正当江心公园渐入佳境之际，福州城和仓山区同声播响了大建设的金锣银鼓。架设三县洲闽江大桥的蓝图，一时间让古老的三县洲进入史无前例、七彩如虹的新时代。为了独塔多跨式斜拉索大桥的横空飞架，风雨三县洲又一次做出奉献：岛内树木迁移、花草荒废。与北岸建筑斗艳、与南畔风光争辉的巍巍桥塔耸立的大桥飞架之后，“三县洲大桥”之命名也就自然天成。既为远古的三县洲命名，也为大桥本身命名。古老的三县洲从此让名于大桥，渐渐地以“江心公园”的芳名取而代之。

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度兴衰之后的江心公园，在2013年，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明

媚之春。在全方位修复中营造浪漫、青春、绿色的生态人文型岛屿公园，使之成为独具个性、魅力无穷的福州新人文生态景观岛。为突出生态自





然美，从省内外引进各种林木花卉，把江心公园妆点一新。彩化香化了的“林中栈道”“阳光长滩”和“环岛观江亲水漫步道”诞生了；展示人文景观、青春氛围，突出爱情岛主题的“临水广场”在公园里标新立异了；集演艺、休憩、纪念三大功能于一体的演艺广场笑颜展露了；高低错落的现代园林景观“逸趣园”妙趣横生了……

江心公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方集萃锦绣的精致之地。

春天的桃花、山樱；夏天的茉莉、太阳花；秋季的丹桂、鸡蛋花；寒冬的蜡梅、一品红……一年四季的江心公园，都在花枝招展。又有一群群白鹭岛上翻飞、百鸟啁啾、仪态纷呈。婀娜多姿的花草树木，在四周晃荡着清纯江水的岛上色彩缤纷。榕树如须的气根垂披而下，悬挂的须根触碰到地面后，在水分充盈的泥土中，快速生根形成支柱，托住树冠，使原本独木的榕树蔚然成林。有文人说，一株榕树一片林，不无夸张。据说孟加拉有一种榕树，其气根多达 4000 余条，蔚

为壮观，其树冠可以覆盖 15 亩左右的土地。而江心公园立有数十株古榕，如遮似盖，也就不足为奇了。株株榕树下的树木花草，阳光就显得十分珍贵，于是，“抢阳光”的植物天天向上，也就成了江心公园一道独特的景致。

或在高天丽日的晨光中、或在追逐梦想的夜幕下，漫步幽静幽雅的江心公园。如履平地地走上钢箱梁悬索桥，伫立于桥中，只见休闲的人抑或是爱河中的恋人，三三两两，在徐来的江风中怡然陶然，新时代幸福感充溢在人们脸上。惬意间再举目环望，只见近在咫尺、以仿欧式古典建筑为风景的南台明珠中洲岛，与林木深深、葱郁垂阴、天蓝地绿水清的江心公园互为映衬，凸显特色的人文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织成闽江上一幅色彩缤纷的挂图，怎一个美字了得？置身于如影似画之中，静静地聆听超凡脱俗、数百里奔流的闽江水，哗啦啦如歌似吟，无穷尽地涌流着乡愁，又永无倦意地讲述着天地间那妙趣横生的多彩故事……

光景已自成追忆

黄河清

吸引我去看烟台山欧陆遗风遗构的是朋友圈里的一则微信，那几张泛着黄斑的黑白照片深深吸引着我，面对这一张张旧照，会有一种穿梭在漫长时光隧道而不着边际的感觉，会有一种怀旧的氛围萦绕着并勾起对流年况味的追忆。

深秋上午的阳光，拨开厚厚的云层，放射出柔软的光芒，照在闽江频繁荡漾的波浪上，煜煜

闪烁。江的南岸就是仓山，仓山古称天宁山、天安山、藤山，烟台山则为藤山的一小峰。据《藤山志》记载：“自元末清初，中州设有炮台、炮城，因于隔江藤峰绝顶，设立烟墩，以为报警之用。”故名烟台山。此地山不高而清幽，水湛湛而碧透，林蔚蔚而葱郁。古时梅坞至程埔头，盛植梅花，明代诗人徐燠赞其“十里花为市，千家玉



烟台山旧影

作林”，故又有“琼花玉岛”之美誉。

福州拥有 2200 多年的建城史，而烟台山一带直到元初始成村落，俗称“十境”。明代在此设立盐务官署，盐仓林立的烟台山下遂成为著名的食盐贮运中心；1685 年，清政府设闽海关南台分口，商贸活动日益活跃；五口通商后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被外国势力所占据。100 多年来，历经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流，烟台山已然领福州近代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福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西洋建筑式样的活化石。

让我们穿越历史，去搜寻尘封的记忆，打开那一扇扇久未转动的门，抚摩茉莉花那一页页泛黄的影像。

过三县洲大桥，一条灰白的柏油路漫上山坡，这就是对湖路，对湖路的得名是因为过去在

路的两旁，有“爱庐”和“梦园”两座别墅，各有一口大池塘如湖，隔路相对，故名。然而庐、园尚在，湖早已淤塞填平，只能从这命名中体会荫浓烟柳藏莺语、香散风花逐马蹄的水香水色了。

对湖路前面就是马厂街，拐进一条弄堂，两米来宽，两边墙底是块基石，上面是斑驳的白石灰墙壁，白灰墙里锁闭着一座青砖的西洋风格小楼，这就是建于 1932 年的忠庐。远远地就能看到院子里满楼墙的爬山虎藤叶在晶光闪烁的清风中任性地摇曳，几竿修竹在大榕树的须根下轻摆，窄窄的门檐上丛生着杂草。从虚掩的墨绿色木门门缝里望去，几株百年芒果紧紧围掩着两层的青砖小楼，据说这些青砖都是从日本购回，忠庐的建造者许省庵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福州电气公司会计师，现在守着忠庐的是许省庵的外孙应荣荣，他说这里住过辛亥革命志士黄展云和堂兄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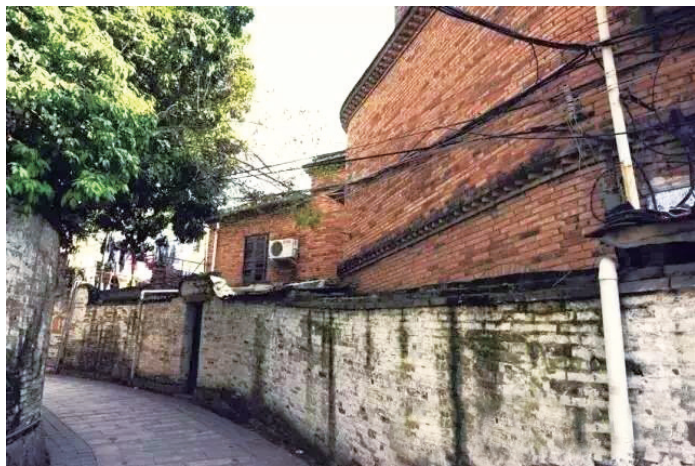
爱庐



梦园



忠庐



马厂街

翼云，20世纪7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英文秘书吴淑贞亦在此居住了十年。忠庐寂静，唯有青砖上的层层绿苔透出年轮。

沿着白色的墙蜿蜒向前，阳光忽明忽暗地洒在身上，我眯着眼睛，慵懒地行走，思绪中臆想着小巷中曾经发生的故事。过了拓庐墨绿色的正门，便是梦园的后门，唤作“梦园别径”。而要寻梦园的正门，就要转入康山里了。

康山里是一条窄而幽深的巷道，六七十厘米宽的青石砌成的路面，泛着亮光。因了梦园，这窄窄的巷有了浓浓的文艺范。若下着蒙蒙细雨，总会让人忍不住幻想有撑着油纸伞散发着丁香气息的女子与你擦肩，而梦园就在转角处。梦园从建造形式和外观上看，应属于欧州古典时期建筑风格，并具有某些古希腊建筑特征，院里主楼第一层券廊的石阶叫梦梯，这种入口处室外小梯的设置又类似于印度的殖民地建筑。楼后的小园子隐藏着一口古井，青砖垒成的井壁，砖缝里的青

苔和花草见缝就长，一些沾满氤氲之气的枯叶散落在井底，一种古典气息里泼洒出的湿淋淋的水汽依稀可辨。挂在墙上的摄于1930年的梦园老照片，透露出梦园当年的新俏，满庭的花卉，仿佛散发出阵阵清香。

梦园的主人叫叶见元，是马来西亚婆罗洲华侨，基督徒。叶见元当年曾跟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系同盟会会员，梦园成为革命的联络据点，梦梯下逼仄的楼梯间里，油印机曾沙沙作响，一份份进步刊物散发墨香。孙中山先生来福州时就住在梦园，梦园之梦，亦是进步之梦、革命之梦、兴国之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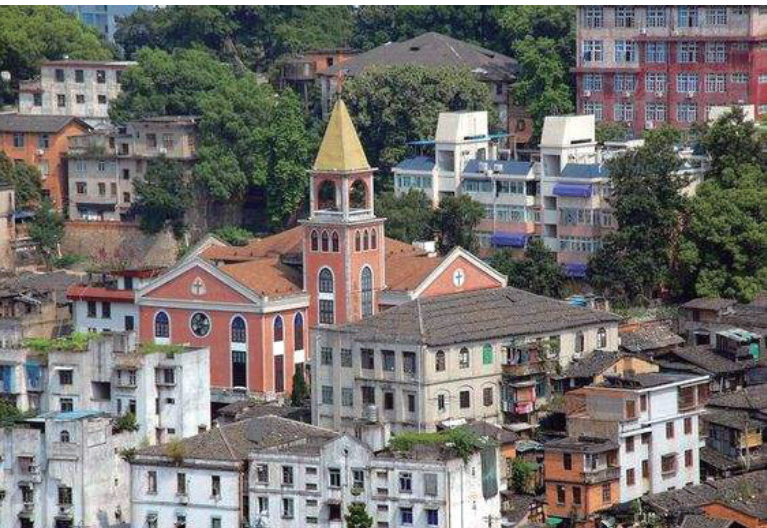
从马厂街到康山里，一路我邂逅了忠庐、拓庐、硕园、爱庐、可园、以园、梦园……俨然是清末民初的一道文艺风景线。谁家姑娘一双素手轻轻推开临街的木窗，挥出半个身子，一袭素雅的旗袍透出明媚的光，亮了檐瓦上的兰草，亮了马路上的青砖，亮了小巷身后长长的光阴。

出马厂街至麦园路，从此处望去，明代时，眼之所及遍植梅花，诗云：藤山南北万株梅，十里浮香壁月来。清初梅林毁于战火，乾隆年间垦荒种麦，故名麦园。巷子中一棵高大得惊人的老榕树参天而立，显得极为突出，树冠宽阔婆娑，枝叶掠过整条道路，须根密密麻麻，齐整地一排排垂落下来，好像在树干上挂满成百上千条的麻线。透过老榕树横过的院墙，你能看见两幢相连的古朴建筑默立园中，这就是建于1854年的美国领事馆，东侧的领事馆办公楼砖木结构，高雅明快，西侧的领事馆官邸为方形平台，地上二层，东南两面设外连走廊，四坡屋顶，带阁楼，清水墙面，乳白色窗户，颇具欧洲新古典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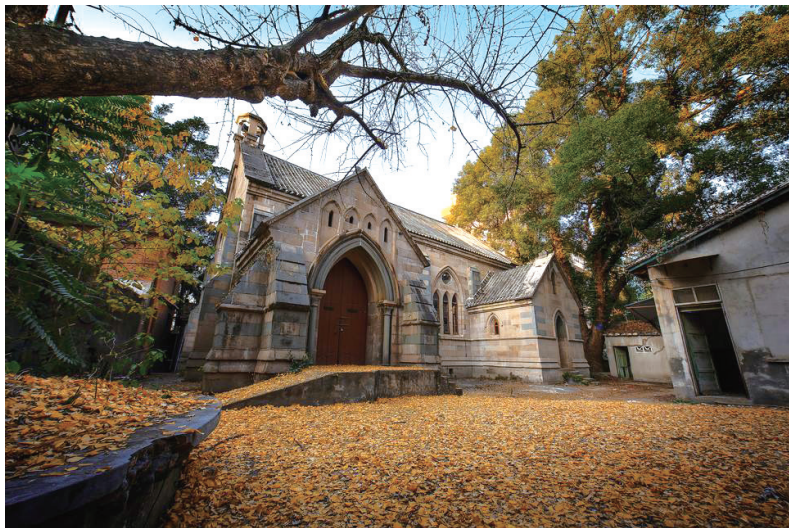
一路行到顶，即至乐群路，你就能看见一座三层红砖西式洋楼，这就是“十年动乱”后中国第一所省级神学院“福建神学院”，1941年福州的美以美基督教会改为卫理公会，总部即设于

此。再往前行，就是创建于1881年的英华中学，美志楼为罗马旋门式红砖灰瓦三层建筑，与它遥遥相望的是一座哥特式红砖建筑的礼堂。当年郁达夫在英华中学礼堂为师生作题为《文艺大众化与乡土文艺》的演讲，林徽因在这里作了《园林建筑艺术》的讲座。英华中学在一批思想进步开明的爱国人士的引导下，百年来培养造就了包括13位院士在内的一批卓越人才，改变了当年福州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推动了传统教育向近现代科技教育的转变。

从乐群路出池后弄便是仓前路的天安里古巷道。巷道修建于清代，一条长达127级的石板阶直通山顶，石阶的边缘已被磨蚀得呈不规则的锯齿状，石板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迹，记录着悠悠岁月里，脚底下一寸寸被丈量的时光，在清莹里静静地沉淀出一种沧桑的质感。步履轻轻地徜徉于这样一个被古建筑群包围的巷道，空气中



天安堂



石厝教堂

仿佛蕴含着某种独特的情感，似乎能洞悉人生的坎坷与悲欢。仰望古巷道的尽头，十字架在逆光中肃穆庄严，仿佛要穿透苍穹般去一窥天堂的神秘，这就是天安里的天安堂。这座哥特式的建筑建于1856年，由美国传教士麦莉和博士筹款建成，是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建的最早教堂，也是在整个东亚建造的第二座教堂。现在看到的天安堂是1996年教会自己拆毁百年老堂重建的，挑高的门厅和气派的大门，圆形的拱窗和转角的石砌，尽显雍容华贵、浪漫与庄严的气质，但已没有了岁月长河留下的或深或浅的斑痕。

天安堂不远处就是石厝教堂，一群青年男女在那棵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银杏树下玩得不亦乐乎，金黄的银杏叶纷纷扬扬地飘落，铺就了秋的色彩。这座石砌的哥特式教堂建于1860年，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建造，当时称圣约翰教堂。教堂仅一层，外形高耸，房顶左右由单塔与双塔相

连，全盛时期，单塔顶部砌有钟阁，内置铜钟，石壁上有6扇窗户，顶端呈弧形尖突的几何图案，窗户上镶嵌着花式窗棂及五彩玻璃。教堂早已停止了弥撒，一切都尘封在岁月的深处，曾经的气场如今已随风飘散……

有人说，在烟台山上还有比爱国路2号身世更为复杂的建筑吗？此话不假，爱国路2号在福州近现代史上频频亮相，以不同的身份记录着历史。这座融合了西方古典主义、巴洛克、殖民地式等多种风格的建筑建于1863年，最早为J.Forster洋行所有，在福州经营茶叶生意，后几经易主，在1891~1928年近40年间作为美国领事馆使用。时任美国驻福州的领事葛尔锡曾写信给美国助理国务卿，强烈建议买下爱国路2号，信中提到：“这座房子是港口最好的，装饰华美，居住舒适……并坐落于洋人区中部，与各大领事馆往来便利。”



仓山公园路振庐



修缮后的爱国路2号

走进即将修葺完成的爱国路2号，一棵巨大的百年香樟树宛如一把撑开的绿伞，散发着沁人的叶香，树下一层层的梅花形喷泉缓缓滑落的清泉荡漾起小小的涟漪，四周一丛丛的冬青在微风中发清发亮。湛蓝的天空下，高大的欧洲古典复兴式雪白建筑历经岁月的剥蚀，依然真切地站立。从这里可以俯瞰烟波浩渺的闽江，尽收方圆十里的世相景致，令人有一份说不出的舒适和宁静。

位于烟台山顶西侧的乐群路10号就是当年英国驻福州领事馆。1844年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从乌石山积翠寺迁到仓山，次年，在乐群路建设领事馆，1870年，又在马尾的马限山上建了一座分馆。1967年乐群路的领事馆被拆除，仅剩基础底座。从保存在福州市档案馆摄于1860年的领事馆照片看，当年，领事馆为坐北朝南的白色欧式双层木结构楼房，端庄大气，上下两层

各分四大开间布设，共计8间，周边均为通廊贯通，窗、门为长方拱形设置。办公楼西向建有一座正方形双层欧式白色住房，沿坡建有英国式单层宿舍。然而，这一切都已灰飞烟灭，听任岁月悠悠，芳草斜阳。

乐群路往东就是梅坞的地界了。梅坞作为一个地名，泛指烟台山东坡的梅坞路、梅坞顶及梅峰里一带。旧载梅坞一带明代盛栽梅花树，称为梅花坞，后简化为梅坞。人们到此，无须问路，只要问梅，便可上梅坞来，明代诗人谢肇淛《藤山看梅》诗曰：“不识山中路，逢人即问梅。繁枝围屋隐，老干压墙头。瘦藉轻烟外，开须夜雨催。春光未衰谢，携酒想千回。”“梅坞冬晴”成为古代福州南台八景之一。至于梅坞之梅如何被毁，民间有个动人的故事。传说，清顺治年间，郑成功军队被清军围困于藤山，时值隆冬，粮草断绝，将士们饥寒交迫。这天深夜，忽有一群如



英国领事馆 1910 年 (来源:《中国通商口岸插图》)



美国驻福州领事馆办公楼



花似玉的姑娘飘然而至，手撒梅花瓣，纷纷扬扬落地化作仙果，让将士们充饥。郑成功醒来大呼：“梅仙助我，没齿不忘！”后来，郑成功顺利突围。清兵进驻藤山后，听说是梅仙助郑成功一臂之力，便下令将梅林焚毁，从此，梅坞山渐荒芜，梅无踪迹。这古时极其雅致的地方现在被辟为烟台山公园。公园正门入口处，旧时是明真庵，入梅坞赏梅的人都会在此小憩，但此庵已没入历史的尘埃，只能在丛丛杂草中臆想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烟台山的道路随着山势起起伏伏，弯曲迂回的甬道和小径，排列着一连串百年以上极具保护价值的院子、庐、园、公馆、小筑、精舍、楼、堂……总数不下 200 幢，把这座方圆不过二三十公里的山地打造成了建筑的艺术空间。有人说，烟台山是仁义之山、名医之山、近现代文化教育启蒙之山，是神性之山、母爱之山、避暑胜地，到烟台山可以看万国建筑、南台四景、烟台山十景，走深深小径，品小园春秋……

沿着被一幢幢古老建筑挤压得窄窄的小巷往回走，踩着一级一级圆润光亮的石阶，如同踏在琴键上，弹奏着一段最古典的乐曲。你可以沉醉其中，目不斜视地穿行于浮生流年，如同光阴百年如一日地在这巷道中踱出的方步，慢悠悠且悄然无声。是啊，古老的建筑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承载着沧桑与历史的记忆，透露出地域文化的神秘气息，给人以心灵的抚慰和情感的追忆。

梦松居和它的主人

陶真

在仓山马厂街20号，有一座古朴的小楼，叫梦松居。周围分布着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小学。紧邻的是桃花山和师大附中，转个弯是师大生物系，再远些是九中、十六中及仓山小学。这一带房屋依山错落，道路沿山起伏，绿荫繁覆，宁静优雅，弥漫着校园区所特有的书卷气息。

这个梦松居，楼房不大，只有两层，外砖内木结构，但院子很大，有一两亩。里面种了各种的果树，龙眼、荔枝、黄皮果、枇杷、木瓜、香蕉；还间种了葡萄、玉米、向日葵等；墙上爬着红红火火的三角梅；也养着狗、猫，生气盎然，充满生活乐趣。就是这幢小楼，走出了一个个不



梦松居

同凡响的翘楚人物。

一

梦松居的第一代主人叫丁先诚，祖籍在福州十邑之一的古田。1919年，他买下这幢小楼，举家迁到这里。

丁先诚早年就读于鹤龄英华书院，擅长组织活动，是校学生会的会长。这个学校是同盟会在福建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同盟会骨干、孙中山的挚友黄乃裳曾在此工作，担任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的教务长，以此为掩护开展反清活动。丁先诚在这里参加了同盟会，是福州第一批剪掉长辫子，与封建社会决裂的青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黄乃裳以福州桥南社体育会的名义秘密开展军事斗争准备，组织学生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并从中挑选一批骨干组成“炸弹队”（敢死队），丁先诚是成员之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福建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决定于11月9日发动起义。11月8日晚，丁先诚等42名“炸弹队”成员秘密潜入福州城内，翌日参加攻打于山的战斗。胜利后，被福建军政府授予二等勋章。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来到福州，福州基督教各派领袖在烟台山天安堂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丁先诚书法健美，担任记录。是他将孙中

山演讲完整记录下来，向国内外传播。

1914年，丁先诚留学美国，就读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文科硕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福建协和大学教育系教授、代主任，中华美以美会全国宗教教育总干事，福建省基督教协会教育部部长，卫里公会教育部部长，义工短期训练班总干事。

新中国成立后，丁先诚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过福州市人大代表、仓山区人大代表、民革仓山区主委等职务。1979年逝世，享年88岁。

二

梦松居的第二代主人中，长子丁汉波尤为出



1912年孙中山来闽会见福建同盟会会员时的合影，后排左一为丁先诚

色。

丁汉波 1912 年出生，从小就读于福州培元小学、福州英华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抗战爆发，华北沦陷，1940 年，他受福建协和大学函聘回福建工作。正值战乱，一路艰难。先是乘船回闽途中，在福建海面遇海盗抢劫，丢失全部行李，包括教学科研用的资料、标本，只好折回上海。重新备好资料后，再次乘货船南行，途中，又遇台风和日本炮舰，船只好停泊在闽东的一个小渔港，而后步行 7 天才到达福州。接着，到内迁邵武的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

1947 年，丁汉波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主攻动物学，1949 年获博士学位，即被选为美国科学进步荣誉协会会员，并留校任动物学研究员。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他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到祖国。

丁汉波回国后，先后任福建师范学院（现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生物系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生物系主任、发育生物学研究室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在脊椎动物学、动物胚胎学及发育生物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建树颇丰，曾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专著 90 多篇（部）。其编撰的《脊椎动物学》《发育生物学》是高校生物系的重要教科书，关于蛇、鸭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鸭的人工受

精和杂交研究而培育出的“半番”鸭，深受农民和消费者欢迎，今天仍在广泛饲养。习近平同志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时，曾专程到福建师范大学拜访他和甘景镐教授。

丁汉波在梦松居前后住了 80 年，即使外出求学、工作，家也都安在这里。他担任师大副校长后，学校安排他住校长楼，他谢绝了，他很喜欢这个庭院。他喜欢动、植物，分不清是职业的习惯，还是爱好，总是亲自动手植花种树，修剪花草，饲养动物，与动物纯真友善地相处。地面破了，他会自己动手，和水泥修补；电路出问题了，他会自己当电工。院子始终干净、整洁，洋溢着清新、平和的气息。

三

梦松居还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百岁老人陈淑楣。

陈淑楣曾是中共地下党员。1914 年出生于古田，父亲是当地商会会长。陈淑楣从小聪颖好



陈淑楣

学，学习上很有天赋，颇有见识的父亲一改旧农村女子不上学的旧习，送她到福州求学。1937年，陈淑楣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到毓英中学任教。当年，这些学校是福建进步思潮传播的中心，孕育过许多的先进人物。在那里，她认识了英华烈士刘朝绅的嫂嫂刘敦平，刘朝绅是中共闽江工委庄征在英华学校发展的几个中共党员之一。通过刘敦平、刘朝绅，1939年陈淑楣成为北迁顺昌洋口后的中共英华特别支部的成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根据上级关于“隐蔽、精干”的要求，英华特别支部停止活动，成员分散隐蔽，陈淑楣和刘敦平先后到了古田陈淑楣老家，后转南平，刘敦平是陈淑楣的上线。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形势紧张，刘敦平和也到南平的原英华支部书记许世华身份暴露，陈淑楣利用在英华女校任秘书、掌管印章的便利，为他们办了通行证，掩护两人离开南平，转到后方。此后，陈淑楣与上线刘敦平失去联系。1948年发生“闽江工委事件”，庄征、刘朝绅等人被错杀，一些由他们发展的党员也与组织失去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健在的党内同志在回忆中清晰地记述了这段历史，如原省气象局局长黄裔禹回忆：“1940年间，我到洋口英华中学和顺昌城布置工作时，英华中学已成立支部，许世华为书记，支委有：余泽波、陈淑楣、刘朝绅……”“1940年秋末初冬，我又一次到顺昌，



1990年春节省领导陈光毅、陈明义、何少川登门看望时的合影

主要任务是向英华特别支部传达关于‘精干、隐蔽’的指示，撤退有被捕危险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仍健在，但也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刘敦平在95岁高龄还专门写下文字，记述陈淑楣在党内活动的这段历史，以示对同志的负责。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陈淑楣仍然追求进步，一心向党。1942年，她与同乡、协和大学生物系教师丁汉波结婚，婚后，她积极帮助丁汉波在政治上进步。在她的帮助下，丁汉波同情共产党和进步学生，曾掩护被追捕的协和大学进步学生，将其隐藏在自己家里，而免遭特务的迫害。1947年丁汉波赴美留学后，她通过写信和投寄进步书籍来帮助丁汉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即写信召回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丁汉波。而在丁汉波担任重要的教学科研领导工作后，她提早退休，一心一意支持丁汉波工作，丁汉波的功勋章，有她的不可或缺的一半。

花灯的记忆

陈敏华

我的老家在南街的塔巷和黄巷中段，对南街是熟之又熟。20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那几年，每逢大年初四到元宵节，都要在这里帮舅舅卖花灯。

寒假一开始，母亲就派我和二哥、三哥到舅舅家帮工做花灯。做花灯是舅舅家祖传的手艺，每年舅舅都要制作大批花灯在元宵节前出售，这是舅舅家一年里最主要的收入。所以，每年从11

月开始，一到星期天我们都要轮流到舅舅家帮忙；学校放假后三兄弟就得住在舅舅家里，直到年三十前几天才回来。为了多赚点钱，我和表弟从正月初四起就在后街灯市上卖。这样，在春节前就要陆陆续续把花灯从舅舅家运到城里。

舅舅做的花灯种类繁多，飞禽走兽都能入灯，有狮子灯、玉兔灯、绵羊灯、雄鸡灯、仙鹤灯，还有宫灯、走马灯、关刀灯、杨桃灯等；表



现形式有提灯、吊灯、举灯、摆灯、行走灯，舅舅最擅长、制作批量最多的是荔枝灯。舅舅有一套祖传的制作工艺，所以能一枝独秀，旁人不敢轻易染指，荔枝灯几乎成了舅舅的专利产品。

破竹削篾、扎制灯骨、裱糊内壁，这是制作所有花灯的主要程序和基本技术；这些工作大抵在元旦前完成。做荔枝灯关键的技术在于如何表现荔枝表面的泡状折皱，这是最烦琐、最费力、手工也最精细的一道工序了。首先要把红纸裁成八厘米长、五厘米宽的长方形，每十张一叠，铺在特制的竹筒上，每个竹筒铺两叠，首尾相接。然后用粗细适中的麻绳一道道紧紧缠绕在红纸上，接着用与竹筒紧密配合的套筒挤压红纸，当红纸宽度被挤压至三厘米时，每张红纸就形成既有弧度又有折皱的模样了。

这道工序对纸的厚薄、麻绳的要求比较严格，纸厚了或者麻绳粗了，体现不出清晰的折

皱，反之，纸又容易破损；操作的要领是缠绕要有力，每道间隔要适中、均匀。这道活通常由舅舅、外婆和二哥来完成。接下来的工序，就由孩子们上阵了，两个表妹负责把每叠红纸小心地一张张分开，那是女孩子方能胜任的细活。我和表弟则负责把每张红纸的一端捻尖，抹上浆糊，再沾点金粉或银粉。最后一道工序是装配，把沾了金银粉的红纸，尖端朝下，错落有致地裱糊在荔枝灯架上，然后穿好提绳、绑上提把，挂上流苏、插好蜡烛，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最后一道活也是由舅舅、外婆和二哥、表哥来完成。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紧张忙碌的劳作，一直要持续到除夕前一天。而我和表弟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开始，就要陆续往城里运送花灯。

舅舅家在三叉街，从这里到家足足有十几里路，一清早两人扛着三米多长的大竹竿，上面挂着四五十盏荔枝灯，从舅舅家出发。





一路上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在宽阔繁华的街道上，要小心翼翼地避让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通过解放大桥时，要时刻提防着花灯被江面上的大风刮跑或撞烂；在拐弯处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缓慢地移动，因为是扛着三米长的竹竿，更因为竹竿上的花灯是纸糊的，来不得半点疏忽。开始时大约一里路休息一会儿，到后来歇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休息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恼火的是越接近城区，歇脚的地方就越难找——路边都是大树，低处没有树丫可供借用，想歇都歇不成。两人又累又渴，十几里地足足走了近四个钟头。到家里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也已筋疲力尽，只喝了些水，就倒在床上，饭也不想吃，只想一直躺下去。毕竟，都才十一二岁呵！

旧时南后街紧挨着南街西侧，是与南街平行的一条文化街。它不像南街那样有像样的房屋，多是木瓦房，是典型“纸裱裱”的建筑。这条街的店铺多数是做书画、裱字裱画、工艺品、

花鸟玉石和篆刻生意的，当然也有食杂和生活用品铺以及做冥间用品生意的店铺；此外，这里还有两家全市最大的典当行。这条街每逢元宵节期间都被辟为灯市，按惯例，从初五开始禁止车辆通行。为了占个好地段，我们都要提早一天来摆摊。灯市约定俗成的规矩是，谁最先使用的地盘，此后一般就归谁使用。母亲老早就看好了一块地方：在一家裱字画店铺门前，有很宽的屋檐可以遮阳避雨，人行道边两棵树的距离刚好可以撑住三米多长的竹竿，确实是个理想的摊位。为保险起见，大年初一，母亲特地到那家店铺向老板拜年、打招呼，请他照顾并且在必要时作个见证，同时，又在两棵树上绑了两根绳子作为标志，这才放心地回家。

到了正月初四这天，吃了早餐，我和表弟带上零钱，扛着花灯出发了。从南街到后街穿过小巷很快就到了，到了裱画店门前，系好竹竿，母亲领着我们见过老板，请他以后多多关照，老板倒是很爽快地允诺了。过了一个多钟头摆花灯的



摊位才逐渐多了起来，但是，由于灯市到明天才正式开张，所以摊位看过去仍然显得稀稀拉拉；游客虽然不少，但看热闹的居多，他们今天根本没有准备买花灯，大部分只是打探价格或浏览一下品种，为下次购买时打底而已。所以，尽管母亲一个劲地向询问者夸奖荔枝灯如何物美价廉，一个上午却只卖出一盏灯。将近中午母亲就回家做饭去了，此后，卖花灯的任务就全部落在我们表兄弟俩身上了。吃午饭时分两人轮流回家吃饭，这天下午也只卖出一盏灯。

第一天开市的成绩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给我们打气：以后生意一天会比一天好。嘱咐我们要勤吆喝、勤介绍；对顾客要和气、耐心，特别是人家不买，也要一样热情，说不定他还会回头；如果冷脸冷面对人家，就再也别指望他会回头。同时，母亲又一再叮咛，在初十之前每盏灯不准低于三角钱出卖，只能尽量往高里卖，以后怎么定价，视灯市行情再说。

果然，花灯卖得一天比一天多。一开始我们两人都羞于开口揽生意，过了两天也就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坦然多了。

逛灯市的游客大部分是携着小孩来的，这时候，我们会无师自通地把推销的重点放在小孩身上，向他们宣传荔枝灯如何好玩、漂亮，晚上点起蜡烛更加好看，买一盏回去就知道了等等；而对大人则只是扼要地说明荔枝灯做工精细，不信可以逛完整个灯市再来卖，花钱绝对值得，绝对不会后悔。



遇上老太太、老大爷来买灯是令人头疼的事。他们喜欢提起灯笼端详半天，然后东找一个毛病，西挑一个缺点，把花灯贬得一无是处，每逢这时候，我就把表弟推出去应付。其实这些上了年纪的顾客倒是识货者，他们多数还是打定了主意要买，一番挑剔无非是为了压低几分钱，有的走了一圈后又回来砍一轮价。

最爽快的买主是年轻的爸爸，他们手抱着伊呀学语的宝贝，一手交钱，一手提了灯笼就走。还有就是那些攥着不少压岁钱，衣着光鲜，独自或结伴来逛灯市的半拉不大的纨绔子弟。他们出手要比他们的老子大方多了，仿佛这钱是他们自己挣的，满脸优越感。

在生意清闲时，我出神地看着打扮得花花绿绿、悠闲来往的游客从前面走过，特别是那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羡慕他们。这类游客早已过了打着灯笼满街玩的年龄，他们多半是来逛热闹的，而且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我羡慕的正是



这一点。在这个中国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里，多么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和同伴们到处神游、尽情嬉戏！

这几天，几个铁杆同学或单独或结伴来陪着闲聊，帮着高声叫卖。只有他们来的时候，抑郁的心情才有所缓解，可是等他们一走，心头又被阴影所笼罩。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同学，可是又怕看到更多的同学，特别不愿意看到那些高干子弟，怕受到她们的耻笑；也不愿意看到女同学，怕受到他们的嘲笑。不知道这些同学看见自己在沿街叫卖会怎么想？

……

在五味杂陈中，我在南后街度过春节期间的这一段特殊经历。

更正：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疏漏，误将2018年第1期封二作者江松标为江爱松，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母亲的太平燕

沉 洲

因为身体缘故，母亲早早病退，回家却又闲不住，终日忙于家务，成为不折不扣的家庭妇女。每到年节，她总是提前几天就悄悄忙开了，荤素搭配，做好一桌菜肴敬祖先供土地公，同时，以吃的名义把儿女们招回家团聚。在这满满一桌家常菜里，从来不会缺那样一碗“太平燕”。

年节当天早上，她会拿出之前买好的白纸包，剪断红色棉线，取出薄如纸张的干燕皮，菜刀切成3寸的方片，一片片铺上湿毛巾盖好，使之潮润。然后去准备馅料，把水发后的虾仁、干贝和三层肉剁成泥。还有削皮马蹄，用菜刀压扁后再切碎，这样吃起来脆爽。再搁入切碎的葱

白，加酱油、鸡精，味儿调得稍重些，因为煮的时候一部分滋味将融化到汤里。讲究的话，母亲会再加入鸡蛋清一起拌匀，增加馅料的鲜嫩与弹性。做完这些，轮到把湿毛巾里软化的燕皮取出，平摊掌心，竹箸挑上馅料，往虎口推，拇指和食指拢起燕皮再顺势一捏，便成了圆头散尾的飞燕形状。包好后的扁肉燕摆放篦子上，隔水蒸到八分熟。我们家煮“太平燕”，都是依传统风味小吃做法，在高汤里加入扁肉燕和鸭蛋，滚沸便起锅装入汤钵，撒上葱花、调入虾油、麻油，提鲜增香。

有时，因为季节不到，马蹄还没上市，母亲



会念叨上好久，仿佛缺了一样，便愧对祖先愧对土地公还有我们这些儿女似的。

这道汤料菜深深烙在少年的记忆里，记得，每逢亲戚街坊的婚丧宴席，吃喝过半，鞭炮骤鸣，大菜什锦太平宴跟着就端上了桌，宴会因此进入高潮。这时，整桌人都会放下手中杯箸，等候主人亲临敬酒答谢。其后，你不吃其中的物什不喝其中的汤，长辈们不会多说什么，但那颗白煮的去皮鸭蛋，你就是一百个不情愿，在一遍又遍的敦促声里，你非得吃下去不可。

如今，那大块头的鸭蛋与时俱进成袖珍鹌鹑蛋，作为老爸，我接过母亲的“衣钵”，也开始对女儿苦口婆心起来：鹌鹑就是安全呀！它会带来吉祥平安的。

在闽菜大家族里，“太平宴”算个异数，福州人对它肃然起敬是发自内心的。在100多年的时光里，这种食物从闽北山区传入闽都，在草根小吃位置上坐实，进而跻身中国八大菜系闽菜的大菜之列，地方民俗文化在其间生成了强大的力

量。

福州人的扁肉燕，外形和北方话里的馄饨基本一样。这类食物各地叫法不同，四川叫抄手，广东叫云吞，武汉叫包面，江西叫清汤，客家人叫扁食……尽管各有出处和来历，唯有扁肉燕的品质独树一帜，其薄皮是捶打的肉泥与番薯粉反复搓揉而成，被福州人定性为一种“肉包肉”美食。

不知何时开始，扁肉燕这碗汤料菜里，被厨师加入腐竹、香菇、粉丝、鸭胗、蟹肉等配料，最后改变性质的是去壳白鸭蛋。草根食品扁肉燕摇身一变，成了福州人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亲友聚别宴席上的一道大菜，这期间被时光融入了太多内涵。福州方言里，“蛋”即“卵”，鸭卵谐音压浪、压乱。闽地山多田少，自古捕鱼为生和漂洋过海下南洋讨生活者众多，行船海上把“浪”压下去，生活里再除去各种各样的乱，显然便诸事太平。就这样，它又被叫作“太平燕”，而“燕”与“宴”音同，端上桌就成了出入平





安、吉祥喜庆的“太平宴”。美好的心愿寄托于饮食文化之中，福州话里有了“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吃太平燕，享全家福”这样一类的说法。

如今，福州扁肉燕的手工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获得了很多声誉：中国名菜，中国名点，中国名宴，中国名小吃……

闽都古城南后街是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的中轴街，也是一条商业街，而三坊七巷历来是官绅名士、商贾文人的聚居地。他们对生活精致、奢华的嗜好和需求，成为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发展的沃土。

“同利”扁肉燕就诞生于三坊七巷边上的澳门路，一直以来，它都服务于三坊七巷里的大户人家，也是闽都官厨和私厨扁肉燕皮的供应商。

按传统工艺要求，制作扁肉燕必须精选鲜肉，猪肉温热有活性，不得浸泡水中，或入冰柜保鲜，否则，捶时肉会渗水，并在砧台上四处飞

溅。一大清早从屠宰场采购回来的猪后腿肉，用高压水龙头冲洗干净后，得像庖丁解牛一般，沿各块肌肉隔膜剔下，忌切断肉的纤维，之后剔筋去膜。一旦搁上了砧台，必须一鼓作气捶打下来，特别是夏天气温高，时间久了肉质会慢慢僵硬，难以擀成薄片。

未吃扁肉燕，先来看打燕。说扁肉燕是“打”出来的，当然是以偏概全，但也说明捶肉擀皮技术含金量最高。不是你有了工具，想打就能打成的。扁肉燕入口滑不滑，

咬起来脆不脆，咀嚼香不香，和这一环节关系密切。所以，菜馆和百姓人家都是从专业打燕店买回干燕皮，自己包馅成菜。

打燕极富表演性，韵律快可以像进行曲，慢起来又似小夜曲。讲究的打燕工具，砧台和木槌是荔枝木做的，其硬实细腻的木质经油脂长年滋润，显出深沉的暗红色。直径50多厘米的砧台面对面各站一人，伸出的食指和中指搁于台案，随时翻转、拨拢打散的肉泥，视情加入适量糯米粉以增黏性。和着彼此的捶击节奏，另一手捶下并借力弹起，起落轻盈。“吧嗒、吧嗒”，木槌捶打赤肉的声音，明亮纯脆而不散，让人恍惚感觉到扁肉燕的脆爽和鲜香。

在“同利”店铺前，很多游客就是在目睹了“打燕”表演后，被吊起口腹之欲，进店来一碗，把这福州味道装入心间，带往世界各地。

大约2斤的猪后腿肉，一锤又一锤，5000次的捶打，肉泥终成胶状，黏稠有弹性。肉泥放

上工作台，均匀撒上碾细的番薯粉，边拍打边搓成条状，接着拂去剩余的番薯粉，再擀压成饼。通过一遍遍撒粉、一遍遍碾轧，肉饼渐渐延伸变大。40分钟的时间里，双手不得停歇，唯恐肉泥失去活性。终于，肉泥和番薯粉合二为一，融成一体，形成长10米、宽2米多、厚0.2毫米、重10斤的大薄片。看着光滑油润，嗅之有肉香。若是遇上梅雨天，番薯粉还要放烤箱里烘干才能再用。只要一星半点肉筋和油脂没剔除干净，扁肉燕皮就会穿孔破洞，前功尽弃。

打好的扁肉燕皮再敷上一层薄番薯粉，自然晾干后，切成3寸见方的长条，折叠起来，便成了干燕皮，包装贮存半年不坏。

坊间有一说：福州扁肉燕，百吃都不厌。除了言及扁肉燕的滑嫩爽脆有嚼劲、汤清肉鲜色晶莹外，它那花招多样的吃法，也功不可没。除了风味小吃的扁肉燕和添料加鸭蛋的太平宴，燕皮还有其他几种吃法。切成丝，高汤烹煮叫燕丝汤；肉泥丸沾上燕丝，滚成圆球状，蒸熟，冲入高汤叫燕丸汤；红酒糟煮燕丝汤，再打入鸭蛋，叫酒肉荷包蛋。今人还有创新，把八成熟的扁肉燕油炸，起锅沾辣椒酱、番茄酱，中餐西吃，古菜今吃，此一味，深得“00后”青睐。

“桌上一窝燕，娘子巧手烹。梁上声已渺，窗外小长春。”传说，写此诗者为三坊七巷的苦读学子，看到自己喜欢的食物，感伤时令转换，碗中的扁肉燕已从燕子的形象变成了长春花。这个故事除了衍生出扁肉燕的另一个菜名“小长春”，

燕子的形象依旧挥之不去。而栖息不定的燕子给流浪、漂泊他乡的游子带来无限的惆怅。“似曾相识燕归来”“燕子归来寻旧垒”这样的诗句，都是归燕思乡的情结。由于扁肉燕的草根性，在闽都广为普及，它的味道深深嵌入福州人的记忆，它是一道思乡团圆菜，成为漂泊异乡游子一解乡愁的精神食品。

近些年，陈君凡经常被邀请到国外表演中华美食，他说起一个在美国遇上的故事。一位三代前移民旧金山的老中医，年至耄耋，看完他的“打燕”表演，吃了他煮出来的扁肉燕，双手捧住陈君凡的手，老泪盈眶。他操福州话说：我的家就住在三坊七巷，从小听打燕声长大。这是妈妈煮出来的味道。我又回到了榕树下。

母亲已经86岁，一年前就不再自己动手包扁肉燕了。这过年的味道儿，开始感觉缺了点儿什么，让人心头莫名地不踏实起来。



蒲天寿家族和福建的百年情缘

林本椿

1

在鼓岭避暑的许多牧师，都是医生，常替鼓岭的百姓看病。蒲天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美国人，原是福州协和医院院长。蒲天寿医生的家族和福建有 100 多年的情缘，这首先要从他的父母讲起。他的父亲叫蒲鲁士，母亲叫蒲星氏。

最早来福建的是蒲星氏，当时还没结婚，叫 Miss Elizabeth Fisher，于 1884 年来福建，人们叫她“星小姐”。在华南女子学院华惠德写的《华南女大》这本书中曾提到这位了不起的 Miss Fisher 在华南女子学院办学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便在 19 世纪 80 年代，福州毓英女校（今福州十六中）的教师们就梦想办一所女子大学。这群教师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就是 Miss Elizabeth Fisher，她是 1884 年被委派到该校当老师的。有一天，她听说英华学校的男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

态度说：‘女生不会唱歌。’ Miss Fisher 说：‘哦，她们不会吗？’就在第二天，她开始训练女生唱歌，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女生在教堂复活节早礼拜时唱了《看耶和華躺的地方》。”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过不久，星小姐便被派遣到南部的兴化地区（现为莆田）。根据她家人的传奇说法，若干年后一位在新加坡的传教士蒲鲁士向星小姐求婚，请求美以美会派遣她也到新加坡去。星小姐没有拒绝他的求婚，但是她说：“如果要娶我，请到中国来，因为我爱这里。”于是，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就来到了兴化，和星小姐结婚，做了那里的美以美会兴化年议会的长老。不过星小姐并没有失去对女子教育的兴趣，几年后，她应邀到福州年议会妇女之夜发表演讲，她说：“我早已准备好这个演讲，现在讲已经迟了。你们有些人甚至还在昏昏欲睡，所以我要丢下一颗炸弹。我们要给女子多少教育？如果男孩子可以上高中，我们也应该让女孩子上高中。男孩子能



蒲鲁士、蒲星氏夫妇



蒲天寿

上大学，那么我们也应该让女孩子上大学。男孩子能接受医疗训练，我们也应该让女孩子得到医疗训练。”她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华南女子学院办学过程中，蒲星氏始终是华南女子学院第一任校长程吕底亚最有力的支持者，为了办好这所女子大学，她们共同坚守信念，共同战斗，说她是华南女子学院的创办者之一，当之无愧。华南女子学院的创办者是5月1日，蒲星氏应邀发表演说，除了赞扬程吕底亚办华南女子学院的远见卓识，也提出了华南女子学院应该面对的挑战，她说：“历史是辉煌的！但我们还要面向更辉煌的未来。”

蒲星氏在华生活65年（1884-1949），蒲鲁士26年（1890-1916），他被认为是兴化美以美教会的最早创始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兴化方言，在那里生活，传教，办医院，办学校，深受人们爱戴。1916年，蒲鲁士回美国，几个月后去世，享年53岁。

蒲鲁士逝世后，蒲星氏继续担任善育堂的院长，蒲星氏出任院长职23年，其间于1923年还兼任过涵江、笏石、平海三个教区的布道使，黄石蒲星中学校长，涵江、黄石、笏石、平海四个小学的校长，而她对孤儿的关怀，从未稍减。1934年，蒲星氏正式退休，但她继续服务到1949回美国。她于1955年3月17日逝世，享年93岁。

2

蒲鲁士和蒲星氏夫妇育有7个子女，最小的就是蒲天寿。

蒲天寿医生是福州协和医院最后一位美国人院长，1905年在福建省兴化出生，从小立志学医。1931年，他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医学系（主要研究肺病）毕业后，带着妻子（Dorothy Davidson，结婚后称为Mrs Dorothy Brewster）及1岁的女儿Betty，从美国夏威夷回到福建省。从

1933年至1944年，他被派往福建省山区古田县一间美以美会创设的怀礼医院出任院长职。中国当时面对内忧，就是国共斗争。1933年11月间发生福建事变，战事爆发后，国民党和十九路军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古田。蒲天寿不顾流弹的危险，每日奔波于自己家和医院间，救死扶伤。后来还是有一个昏了头的士兵扫射了他们家，其中一颗子弹直接落在其女儿睡觉的枕头上。



蒲天寿在古田的旧居

中国那个年代，除了内忧，还有外患。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发生卢沟桥事变。当时，从福州行船至古田只能走费时两天的闽江水道，途中随时要面对土匪的打劫。

1938年，美国教会合办的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建成，堪称为当时全中国第一流的医院之一。由于缺乏优秀医资，该院从古田县调任蒲天寿来兼任院长。蒲医生每隔若干个星期就奔波于两地之间。路途的艰辛不言而喻，但最可怕的是后来的日本人，他们占领了福州，严令闽江上不得通

行任何船只，否则格杀勿论。

幸好，当时还是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不敢杀美国人，只是不允许美国人在福州运输医药物资。可是古田县的怀礼医院的药房被轰炸了，怎么办？蒲天寿想了一个办法，他雇了一艘很大的船，上面装满了100多个箱子，其中有一些装着药，其他通通都装着衣服等东西。日本人把船拦下来，喝令把箱子打开来检查。100多个箱子，每一个都上着不同的锁。机智的蒲医师故意拿一串钥匙试，拖延开锁的时间。开了十来个，日本人不耐烦了，挥挥手让他过去。每一次来往古田和福州，总是有这样惊险的故事发生。

1944年，任期结束后，蒲天寿前往美国波士顿诊所工作。另一方面，他到哈佛医学院攻读公共卫生科，并于1946年再到福州，继续担任协和医院院长。1949年，蒲天寿一家人先后离开了中国，蒲天寿则回到了纽约担任卫理公会医疗部部长。



蒲天寿与协和医院医务人员合影

蒲天寿医生和夫人合著的书《教会和医疗布道——在非洲和其他地方》中说：“当时在福州，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已经办了一家很好的妇女儿童医院，医院大楼很漂亮，手术室和仪器设备也很好，但没有外科医生。而福州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布道会也办了一家综合医院，里面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医术高超，但设备和手术室缺乏，外科医生们常感沮丧。把这两家医院合并组成基督教协和医院是再好不过了。医院合并完成了，为新医院筹集资金的是美国公理会和其他两个美以美会。这家协和医院就成了全省杰出的医疗中心。“二战”期间，华东被日本占领时，福州大部分时间没有被占领，协和医院成了自由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后来据蒲医生的女儿惠珠回忆，当年，协和医院欧式的红砖病房大楼是福建最高的建筑，有100多张病床，有全省第一部电梯，病房有省内唯一的暖气设备，还有冷热装置，电灯、电话，抽水马桶，送餐专用升降梯，手术室、供应室、教学手术看台等等。医疗设备是从国外进口的镭电设备、X光机、显微镜、化验仪器等。医院的院长、主任、护士长都是美国专家，实行严格的美式管理、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中国医务人员，是福建省现代医学的发祥地。

在这本书中，他们还讲到一个蒲医生和病人的故事：“有一天，蒲医生正沿着通往城外麻风病院的路上走时，看到一个强壮的中国人挑着120磅的担子，迈着轻快而有节奏的步伐向蒲医

生走来。他看到蒲医生时连忙放下担子，跑向蒲医生，问道：‘你认得我吗？蒲医生，你还认得我吗？’蒲医生摇摇头说：‘不，我不记得了。’这人解开上衣，露出肚子上的伤疤。蒲医生仔细看后，终于想起来了。几个月前这人曾到过医院，几乎快饿死了，非常虚弱消瘦。他已经患胃溃疡几年了，并最终造成梗阻，无法吞食。蒲医生给他做手术，排除梗阻，不仅救了他的命，还恢复他的健康，术后他能挑120磅的担子，一天走25英里。”

3

蒲天寿夫妇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除了最小的大卫离开中国时还很年幼，三个女儿在古田和福州都留下了非常多珍贵的回忆。她们说着一口流利的福州话，蒲天寿还给她们起了虾油味十足的名字：惠珠、美珠和光珠。

蒲天寿一家很喜欢在福州鼓岭度夏，他们在



蒲天寿的儿女在鼓岭的童年生活照

鼓岭别墅的基石还在。女儿惠珠在鼓岭上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她曾回忆起幼时在鼓岭的趣事：有一年夏天她和家人刚上鼓岭，就和几个要好的女孩子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清扫了泳池里的落叶杂物，装满了干净的水。第二天当女孩们准备来游泳时，却看到游泳池里有一头又肥又脏的大水牛，气得她们大哭。

由于语言上的便利，1956年蒲天寿去了闽籍华人聚居的砂拉越拉让江上游的加帛镇，筹备兴建一所卫理公会的“基督医院”，并于第二年由立



2010年，蒲天寿女儿一家在鼓岭基督教堂前合影



2017年，蒲天寿的女儿蒲美珠再次来榕，参访协和医院红楼

侨医生出任院长。蒲医生还带了一位哈佛大学医学院刚毕业的小伙子 Dick 当他助手。没想到这位 Dick 竟成了他的大女婿，因为惠珠在第二年也来了砂拉越，在同一个医院当护士，并且和 Dick 一见钟情。

1965年，蒲天寿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逝世，惠珠夫妇带着三个女儿去了香港。2010年圣诞节后，近80高龄的惠珠和丈夫带着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来到福州，追寻童年回忆。

2010年4月18日，美珠和她的先生也来到福州，见到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她急切地一遍遍访了仓前山住过的老宅，父亲在西门祭酒岭开过的诊所和工作过的协和医院，弟弟曾经任教的英华、华南校园。儿时的同伴，往事的回忆，浓浓的福州乡音，爱吃的糟菜、“碟饼”和“哈噜”，以及当年坐着轿子走过的鼓岭小路，这一切都让她感到格外亲切，带来无尽的回味和感慨。特别看到古田县她出生地的房子——古田水库旁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洋楼，保护完好，让她和丈夫都激动不已，非常感动。她1933年出生在古田，在上海读的中学。弟弟1938年正是出生在福州协和医院，至今家中仍保留着协和医院的出生证。1950年中美断交后，她才随父亲离开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1984年她与家族中多人一起回到福建莆田，庆祝祖父母来华100周年。此次，她带着丈夫是专程来福建寻根的。她的丈夫是位美国教师，曾在日本教中国历史，是共同的中国情结把两个人联结在了一起。

百年石刻 《三百三十有三士记》

卢美松

有日在福州西湖宛在堂，参加讨论西湖公园志的编修会议。福州文史专家郑子端先生提到，在公园正门过桥后右边风雨亭廊前，有一块立石，前面为1933年余江人吴迈七绝诗石刻，背后还有刻字，但字迹比较模糊，看不清内容。出于好奇心和职业敏感，会后我即请郑先生同去观看。

原来刻石是一块约一人高的太湖石，乃石质较为致密的花岗石，经湖浪冲击，石窍玲珑，

十分可人。仔细观察，湖石上半部，可见有许多细密的行楷刻字，首见题目为“福建学使察院三百三十有三士”字样，由此可知是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福建提学使朱筠主持科试取士的一段故事有关。朱筠（1729-1781），字美叔，号竹君，又号笥河，顺天大兴人。清代著名学者、文献学家、藏书家，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翰林学士，著有《笥河文集》。



朱筠《三百三十有三士记》碑刻

此石质坚刻浅，岁久字迹模糊，非拓印难以释读。逾二日，即请善拓工匠郭森茂君来观。郭君即行水洗墨渍，笔者对照新近编辑出版的《朱紫名坊》一书所引朱筠撰《三百三十有三士记》全文（选自《笥河文集》卷七），完全吻合，只是书载朱记全文，但缺少题目和落款。兹将原文录下，以飨读者：

“余奉命来福建，科试福、延平、汀、邵武、建宁五府士，既毕，旋福州试院，实当庚子之夏。余北人，不胜此间之暑也。暇日，于其西偏隙处构小山，号曰笥仙山，诸生闻之争来，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及于海外咸具，刻名者三百余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面山濬池，清泉滃然而出，因名其泉曰‘养亨泉’。《易》曰：‘山下出泉。’言泉之蒙者，必养而后亨也。山之左有门，别为蕉林，林可高五丈余，百年物矣。余辟其莽而得径，通东北隅，亦构小亭，可逃此间之暑，因名其亭曰‘不炎之亭’，而名其林曰‘叶林’。昔唐韩先生除鳄溪之潭，而潮人知学；柳先生作永州《小石城山》诸记，而南人得所指授，为文章有法度，余视此窃内愧焉。而有托于此者，抑以志吾南来与诸生相遭之迹，如是而已。亭既成，当去此，而代余者为余弟石君，亭之石有主者矣。（按：嗣任者朱珪乃朱筠胞弟，于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受任，时距朱筠到任整一年，兄弟相继任学使，亦政坛佳话。）诸生脱不忘余，识余言尚勉劝为学，以学此山也。”

上引朱筠文集中的碑记，不仅缺文前的标题，而且还缺文后的落款。落款文字碑石有云：

“乾隆四十有五年，岁次庚子冬十月十日，大兴朱筠记。”此外文后还附刻：“布衣福清李振涛构山，童子侯官陶灿斗馈石，七十八老（？）人闽任永立鸠工”等字。

民国学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曾缕述亭记颠末。他在《闽中三百三十有三士亭》文中，先叙康熙甲申年（1704）沈涵视学闽中时，曾在学使署内建“友清轩”，植松竹梅。嗣后乾隆庚子年（1780），朱筠视学福建时构“补松精舍”，命多士人致一石，镌名其上，且题亭额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并为之记。而到嘉庆丙子年（1816），汪润之（雨园）学使又使王应绶秀才作亭石之图存署中。辛亥革命以后，学署改为陆军测绘局；后来，运使刘景屏购买原学使署用办“存古学校”。刘氏惟拓旧碑寄示陈衍，陈衍所见石刻碑文乃清嘉庆九年（1804），邵自昌视学福建时，“重列竹君先生旧记，并记缘起”之文。邵自昌在重刊记中说：其前任学使钱云岩学士，见前亭为风所败，遂起重修，并增补山石。因前之亭额已毁，遂改题曰“补石亭”。数日后，他“偶检丛积”，忽得石碑，“整之为还故处”。他又见“竹君先生有记，勒巨石上。石理粗，剥落不可读”。可知朱筠当时所刻之石，体量巨大，且因质理较粗而字迹斑驳脱落，难于识读，故邵自昌即命同游者郑师愈全录其文，重新镌刻。这应是今天所见之太湖石

上的刻文，其石质明显坚致细密。将朱筠书稿与巨石上的文字进行对照，石刻文字虽然剥落漫漶比较严重，但文字基本可读，并无舛误。唯朱筠的《笥河文集》文字缺少标题与落款，而陈衍所引邵自昌重刊旧记文则十分完整，与朱文并无出入，但同样缺少标题。今日得见原石刻、亭记完璧再现，极为难得。为编纂出版《朱紫名坊》一书，本馆连天雄编辑攀爬旧动物园猴山，搜寻再三，也仅得有文字刻石四块。今日在西湖边得见朱筠所撰亭记全文刻石，实乃天宝物华，不使堙没殄灭。如今再现于世，可续闽中文苑一段佳话，无乃大幸之事乎！

清乾隆间，顺天府大兴县名士朱筠来闽主持科试，得岁、科两考通省前列秀士三百三十名。其后历代闽中士人及宦闽官员陆续作诗论赞。如清郎葆辰有诗称“笥河先生操玉尺，闽海抡才尽圭璧”，并说“夫子秉心清且直，园中大雅扶轮如一辙”。嘉庆二十四年（1819），韩鼎芬任福建学政时，曾遍征名流题咏，于道光二年（1822）刊刻成《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图诗钞》行世，其序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前学使朱笥河（筠）学士所建也，学士与文正公（按朱石君珪）同怀兄弟，相继督学八闽，以宏奖人才为己任。闽士感之，循弟子礼，具束修以献。学士屏勿受，令士贡一石，石泐士名。”题咏者亦于《诗钞》中盛赞朱筠学士的良政清风。如李宗翰诗称：“多取廉不伤，我佩大兴朱。好士兼好石，代贽罗琳腴”，“至今闽中靡，清风在亭隅”。王引之诗称：“先生爱

石如爱士，手剔穷岩濯泥滓”，“一士一石抵羔雁，辇来麇至陈阶墀”。白镕诗曰：“羔雁先民贽，遗风不可寻。相期贞介石，于此订知音。”汪守和诗有句称：“投贽不受受一石，受石构亭石罗前”，“前辈风流余韵事，我闻未见心悠然”。曾燠诗赞朱筠“光收七闽海色秀，气压诸岛炎无寒”。蒋祥墀诗颂朱筠，“大开铁网搜珊瑚，一时贤士归砥砺。谒师却辞篋中金，士镌一石千金抵”，“但愿同葆坚白姿，名亭之意取诸此”。

可惜世事沧桑，金石能磨。岁月风雨，人事更革，多少文物因星移而物换。民国邵振绥作《福建经学会园中学士石无多，感赋》，其序曰：“清乾隆时，朱学政衡鉴精明，时人仰之，为建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士各献一石，镌姓名，植园中。今亭已圯，石存者十之二三。”民国人郭白阳在《竹间续话》中称：“近此曾加修葺，而三百三十三石或失，或移置于西湖公园中，不复旧观。”众士一致夸赞朱筠清明廉介，玉尺量才，取士无私无妄，一本公忠。又深感朱筠拒绝士人怀金贽见，改行持石谢师，为文士留永世名，为文坛树清风标。人们纷纷赞赏朱筠倡导的清品介节：“先生教人砺庶隅，重以修能葆内美”，“有如此石立介节，亭亭翼翼常特峙”。石山石亭寄托着朱学使爱士的一片深情，这块石刻更铭记着先贤清廉的美德。当年三百三十三块学士石受到世人的珍视、颂赞，而今时久年湮，硕果仅存者不过数块。这块朱筠亲撰的亭记石刻，独具历史与文物的双重价值，我们应当珍惜，予以妥善保护。

“观猎”与“官烈”

戴云飞

戴云山脉，苍苍茫茫，巍峨瑰丽。发源于戴云山麓的大樟溪，奔流不息。樟溪流经永泰，历360余滩（濑），贯穿全境。

溪流奔袭至永泰与闽侯交界的最后一个村庄，脚步变得有点踟蹰了。已近闽江口，受涨潮时海水顶托，溪流有潮汐现象，溪水回流，徘徊不前。再往前走，就是大海，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或者，只因千山万壑走过，有点依恋。

溪水缓冲，在村子前形成大片的冲积洲，平坦如砥。洲上苇草萋萋，鸥鹭点点。村子背后，则与永泰全境一样，峰峦叠嶂，群山绵延。闽地多山，最多不过永泰。境内仅千米以上的山峰，就多达77座。“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抗战时期，中共闽中省委机关就设在这个村子里。进，与福州近在咫尺；退，一入山中，再也难觅踪影。



大樟溪

村庄依山傍水，门前又有宽阔的沙洲，是块风水宝地。村子里演绎过许多精彩的故事，村名也几度变更。

闽王王审知曾在此地观猎。

唐末世乱。公元885年，王潮（王审潮）三兄弟自河南固始，随王绪举兵入闽。途中，王潮因杀狐疑偏狭的王绪，被推为帅。而后攻泉州，占福州，逐步统治了福建。897年，王潮病故，三弟王审知继位，封闽王。王审知二哥王审邽为泉州刺史。王氏兄弟治闽期间，整吏治，轻徭赋，兴学校，福建成乱世中的一方世外桃源。

享一时之太平，在此期间，王审知多次率部

众前来围猎。

皇家的狩猎，倒也不是纯粹的寻欢作乐。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围猎出行，首先是部队行军的操练。其后则是调兵遣将，摆兵布阵。狩猎当天，部队早早地潜入山中，根据山形地貌，摆下阵势，形成巨大的包围圈，只留出朝溪的一面。时辰一到，以鼓点为号。刹那间，旌旗猎猎，长矛攒动，擂鼓阵阵，猎犬狺狺，杀声震天。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润，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至20世纪60年代，仍有村民报告目击过豹子出没。近年植被恢复，野猪已有泛滥成灾之势，可以想见当年动物之多。一时间，所有动物



官烈瀑布

惊慌失措，东奔西逃，却始终突不出去，只得往人为设置的通道狂奔。及待被赶至开阔地，前有大溪横断，两边是严阵以待的将士，再无去路。真是围猎的绝佳场所，一场射杀由此开始。

动物被围其中，也并非瓮中捉鳖。猎杀有严格的规定，动物幼崽不杀，怀孕的雌性不杀，留有逃生的缺口，误杀是要受严厉处罚的。而动物之中，除了鹿、麂、獐、兔外，也有虎、豹、豺、狼以及凶悍的野猪，凶恶重重。猎杀野猪尤为危险。一击不能致命，野猪会瞪着发红的眼睛，张开大嘴，露出白森森的獠牙，直奔猎人而来。王审知说是观猎，实是在考验将士的骑射本领、敏锐的反应能力以及胆识与勇气。

夕阳西下，士兵们抬着战利品，满载而归。一场围猎圆满收官，村庄又恢复了宁静。但从此，村庄更名“观猎”。村庄原来的名字，已不为人知，那已经不重要了。

时空流转。忽忽过了近500年，元亡。在元朝任过永泰县令的王翰，选择在观猎村隐居，并在村子旁的小雄溪筑“友石山房”，听瀑读书。

王翰，字用文，号友石山人，西夏灵武人，官至元潮州路总管。任上，崇尚文治，政绩斐然。

王翰与写《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王翰”非同一个人。但此王翰也是性情中人，极具诗人气质。王翰隐居观猎十年，时时游历山水，与石对话，逍遥自在。闽县人吴海《友石山人传》说王翰：酷有山水癖，四时朝昏，不问寒暑，曳杖入幽林山谷。每遇石

处，必啸歌盘桓，或解衣而卧，既去复返，眷恋不忍舍离。

如此痴人，隐在山中，怎得安闲？明朝廷慕王翰名，力邀王翰再度出山为官。王翰固守一臣不事二主信念，坚辞不就。最后一次，再也推脱不掉，只得敷衍打发走使者，然后关起门来，沐浴更衣，焚香祭祖，拔剑自刎！

村里人安葬了王翰，感其为官忠烈，再次改村名“观猎”为“官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永泰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从来就不乏忠义之士。1132年，秦桧任宰相，地位如日中天。其时世人还不知其奸恶。邑人黄龟年（永泰白云人，宋崇宁五年即1106年进士），却早就看穿了秦桧的丑恶嘴脸，敢提着脑袋，三次上奏弹劾秦桧，言辞慷慨，直斥其非，痛快淋漓，说秦桧“言诡行谲，外缩中邪”，是不耻、不仁、不畏、不义的小人，还把秦桧一帮党人骂得狗头淋血，致使秦桧才当了一年的宰相，就被罢黜。秦桧罢相后，黄龟年第四次上书弹劾，要求将秦桧罪行公诸天下，以绝后患。可惜此议未被采纳，留下祸根。在此之前，永泰嵩口月洲的一代词人张元幹，也因不愿与奸佞同朝，飘然挂冠，回到福州。1138年，秦桧复相，再度派王伦出使金国议和，前丞相李纲在江西上书反对，张元幹即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一词声援；1142年，因上书请杀秦桧被贬福州的胡铨（字邦衡），再次遭受迫害，被遣往新州管押，张元幹不怕牵连，作另一首《贺新郎·送胡邦衡



待制赴新州》送别。这两首词，写得苍古悲凉，沉郁雄厚。纪晓岚评价说：“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毛泽东也很欣赏这两首词。董必武去世那天，毛泽东一遍又一遍收听张元幹这后一首“贺新郎”。“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王翰死时，子王偁才7岁，由名士吴海抚养，在“友石山房”读书。王偁后来成了《永乐大典》的副总裁。解缙以才气名于世，也对王偁赞赏有加，说王偁“眼空四海，壁立千仞”。但王偁终是不改忠义本性，因抨击时政，最后冤死在狱中。

又过了500年。末代帝师陈宝琛读了明曹学佺《永福山水记》：“游者经王翰故居，龙潭此去十里，其水流为溪，石皆锦色。树欹斜而古，多从竹，竹尽见潭。潭在谷中，其上则水帘也。

有石室在水旁，翰之子偁，读书于此。”对这条小溪，充满了遐想。陈宝琛虽然支持溥仪复辟，在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后，则奉劝溥仪莫做国贼。陈宝琛钟情于小雄溪的山水，对王翰父子也是既钦且仰，几经周折，在“友石山房”遗址上，建了“听水第二斋”，并时时与家眷友人，来此听水论道。

如今，“听水第二斋”也已倾圮，消失了踪影。世事沧桑，斗转星移。

也不全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王翰的墓室，仍完好地保留在官烈。“官烈”这个村名，我想也不会再改。历史深处，总有一盏明灯，始终亮着。

如果说村名改为“观猎”，还有点攀附权势的意味，那么，再更名“官烈”，却是普通百姓意愿的真实表达。

“为官”须“忠义”。旧时如此，现也如此。

萨都刺诗咏闽都

游友基

萨都刺（1272-1355），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蒙古族）人。元代后期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萨都刺在闽前后三年，写下80余首咏闽诗。其中，咏闽都的诗36首（以诗题计）。

公元1335年，萨都刺64岁，由燕南架阁官调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使。他对闽都略有耳闻，其泰定四年（1327）的同年进士张以宁便是闽都十邑古田县人，他们有诗互赠。尚未入闽，收到友人赠茶，他赋诗致谢，“清风两腋归何处，直上三山看海霞”，对闽都盛景，心已向往之。

四月入闽，一路行程一路诗，终于到了闽都。洪塘是进入福州的门户。面对孤塔、百船、灯火、村烟、芳渚、渔歌、旅客……他

吟咏道：“胜地标孤塔，遥津集百船。岸回孤屿火，风度隔村烟。树色迷芳渚，渔歌起暮天。客愁无处写，相对未成眠。”（《夜泊洪塘》）一幅多么明丽的水墨画图！富有港口码头的鲜明特征。

闽都给了这个“白头才到荔支乡”的北方异族诗人太多的新鲜感。“潮水通城蚬蛤肥，万株红荔艳清晖。守臣只恐山飞去，高筑闾闾琐翠微。”



福州洪塘大桥

（《到闽二首》之二）寥寥数语道出闽都潮水通城、城墙围山的城池格局，以及蚬蛤肥、红荔艳的风物特色。《初到闽》云：“片云山对户，一雨水平墀。”依然关注于城市风貌。“绿袖持蕉叶，丹林压荔支。”点赞闽都的特有物产。“城闾南有市，灯火夜眠迟。”描述台江、南台的市集繁荣。闽中雨水充沛，北人多不习惯，故有“苦雨”的感觉。《闽中苦雨》写出了福州春季的气候特点：“三山一夜雨，四月满城秋”，气温凉爽；“江潮入市流”，随时可登船钓鱼，内河与江海相通。

萨都刺公务并不繁忙。福建道肃政廉访司官员有廉访使、副使、佾事等，这是个执掌监察各路地方官、平反冤案官吏的官职，权力很大，级别很低，仅正八品。《石林即事》反映其游宦生活：“三山幕府无公事，多病郎官懒出门。老鹤唤回童子睡，石盆新雨长兰孙。蒲扇屏山紫竹床，岭南五月似秋凉。砚池风动云生石，帘外雨兰吹湿香。”因此，他有闲暇赏景、题画、赋诗、交友。

闽都风光深深地吸引着萨都刺。在闽都，他写得最多的是风景诗。乌山是福州名胜古迹荟萃之地，他多次登乌山。《同杨子承李伯贞避暑乌石山饮天章台二首》：“晚凉上乌石，置酒天章台。夕日下山去，海风吹月来。豪气吐千丈，朗吟动三台。白露洒仙掌，银河泻金杯。谁识芙蓉仙，飞身在蓬莱。”（其一）“高台在云霄，肩輿上绝壁。露下酒樽凉，月出海门白。坐拂衣上云，醉卧林下石。西风吹鬢毛，南斗在肘腋。题诗向天

闾，奎光射瑶席。”（其二）杨子承时为廉访经历，李伯贞时为廉访照磨。该诗勾画出闽都夕阳西下的美好情景，抒写了诗人“豪气吐千丈”“飞身在蓬莱”“题诗向天闾，奎光射瑶席”的豪情。

《立秋登乌石山和幕府》展露了乌山风光的另一面——冷落、凄清，这可能是诗人登临时的心情决定的：“海国山四围，繁华坐消歇。楼观沉夕阳，鸿雁下秋色。水边无丽人，石上存古刻。感此莫归迟，秋露满山白。”《登乌石山仁王寺横山



乌山天章台

阁》：“千尺青莲座，烟霞拥地灵。山川几纳屐，日月两浮萍。鸟没天垂海，龙归水在瓶。深堂说法夜，应有石头听。”描写出乌山浓厚的佛教气息。《题浴鸦池》：“天池霹雳斧斤余，天风万劫吹不枯。白云石间化青雨，落日海眼翻赤乌。银河灵鹊夜度影，月窟老兔时濡须。太平海上银袍客，跨鹤来看浴凤池。”充满神话传说的幻想色彩。登临乌山的诗丰富多彩，色调多样。

鼓山留下了多少文人墨客的足迹与诗文！

“鼓山起千仞，乃是东海垠。蛟龙穴其下，霹雳翻海门。砥柱俨不动，日夜雪浪奔。何当临绝顶，俯视浴日盆。”他这首《望鼓山》描写鼓山高峻千仞、屹立海滨的景物特征，融鼓山传说典故之余，突出赞颂其“砥柱俨不动，日夜雪浪奔”的鼓山精神，诗末表达登上绝顶俯瞰福州城的心愿。在众多吟咏鼓山的诗篇中，亦堪称翘楚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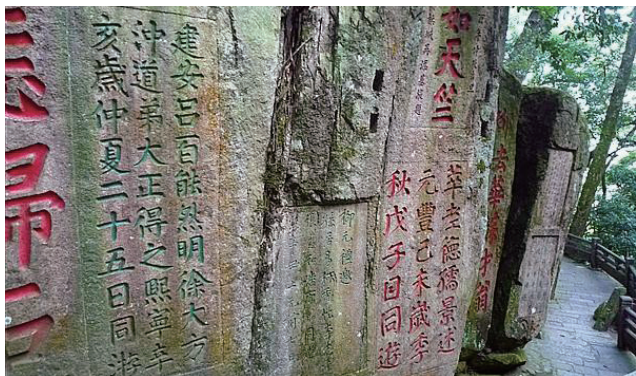
萨都刺浸染在浓浓的闽都文化氛围中，不仅山川草木独具闽都特色，而且食物特产、日常起居也有闽都风味。《题屏风》描写“海国夜凉”的感受。《闽城岁暮》：“岭南春早不见雪，腊月街头听卖花。海国人家除夕近，满城欲雨湿山茶。”展现福州靓丽的风景画、风俗画。腊月满街卖花，欲雨满城山茶，冬日榕城飘荡着花香，简直就是一个花的海洋。《虾助》：“层涛濡沫缀虾行，水母含秋孕地灵。海气冻成红玉脆，天风寒结紫云腥。霞义褪色脂流滑，琼缕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实老，误随潮汐落沧溟。”虾助，即水母、海蜇。萨都刺视福州常见的海蜇是美食美味，还



鼓山山间溪涧瀑布

显得那么神奇。这些诗都透露了诗人对福州的喜爱之情。

怀古诗以景观为中介，把怀古与感时结合起来。《越台怀古》中的越王山，又称越山，即屏山。首联“越王故国四围山，云气犹屯虎豹关”勾勒闽都形胜，虎虎有生气。颌联“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流露沧桑之悲慨。颈联“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表达对历史的一种认知，颇为中肯。尾联“日暮鹧鸪啼更急，荒台丛竹雨斑斑”渲染荒台悲凉氛围，使思古之幽情更悠远、更幽深。《南台月》在“金蛇翻



鼓山摩崖石刻

动三江白，冰轮碾出碧玻璃”的映衬下，推出了抒情主人公“钓龙台上客”的形象，他怀抱古道之心，阅历丰富，黄河、泰山、华山都曾登临，今年，登上了钓龙台。在此闽越国遗址，他想象昔日之繁华，“无诸城里人如海”，而今，“龙去台空三千载”，“无诸故冢埋残霭，无诸台上草离离”，残破沦落。怀古之余，感慨现实，“昔龙已去江悠悠，今龙虽在人未求。”针对新罢科举而发，抨击朝廷摧残人才。诗人认为：“怀珠岂立此台下，要上黄金台上钩。乾坤四顾渺空阔，诗书元气行勃勃。”道出了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追求：“合沙古讖此其时，天下英雄求一决。”福州古讖云：“南台沙合，河口路通；献出状元，后出相公。”据说，历史上有过四次“沙合”，福州先后有章得象、余深、朱汉章、叶子昂四人拜相。然而，现今科举滞选，读书人有何出路？“南台月照男儿面，不照男儿心与肝。”男儿的心与肝，即雄心壮志是什么？“燕山买骏金万斛，万里西风一剑寒。”要为国家建功立业！此诗写南台对月而寄寓飘零之感。

咏物诗《枯荷》：“红云一梦何茫然，绿紫瘦骨擎欲僵。愁多有魂吊秋水，故池日夜凄新霜。鸳鸯相顾魂已泣，白鱼起身银尺立。堂中书客感秋风，一片青衫和泪湿。”有人说此诗亦写罢科举之感，前六句借池中物为比，末二句则明白点出。其实，旨意远超于此，诗以枯荷象征天下之文人，慨叹文人命运多舛。《雪米》借榕城下雪米之景，寄寓期望丰收连年，千古无饥荒的美好愿望。诗云：“万斛珠玑散大荒，六丁谁为发天仓。云孙捧出南箕簸，月姐舂米北斗量。狼戾也知逢稔岁，贮藏元不济饥肠。风流灞上寻诗客，千古无人说秕糠。”

感怀诗《夜兴》谓：“山深日未暝，孤馆孰宾主”，“独立谁与亲，厨人夜深语”。透露了身在异地的孤寂。《北人冢上》写萨都刺在福州城见南人清明节祭奠亲人，而北人流落于闽地，只能望北痛哭，“儿身有禄亲不待，亲坟无主儿义辜。”朔客虽有铁心肠，仍然情惨伤。受此触动，遂生去意：“宦游既知离别苦，何如拂衣归故乡！”一方面，他爱这片土地；另一方面，他为背井离乡而痛苦，内心充满矛盾。

至元三年（1337），萨都刺66岁，八月迁官出闽，官阶升至从七品。

离闽途中写的《舟中题画卷》表现了他对闽山闽水的依恋不舍。“两岸好山如画，丹崖翠壁楼台。爱煞南闽风景，小官何日归来。”“爱煞南闽风景”是他心情的真实表露。人未离去就想着何时归来，对这方水土已深有感情。